

学校代码: 10270

学号: 102200302

上海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论文题目 陈仁炳民主思想研究

学 院 法政学院

专 业 中共党史

研究方向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

研究生姓名 肖师静

指导教师 洪小夏 教授

完成日期 2013年5月

论文题目：陈仁炳民主思想研究

学科专业：中共党史

学位申请人：肖师静

指导教师：洪小夏 教授



中文摘要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社会经历的那场“反右派运动”扩大化的浩劫，使得我国当时大批优秀知识分子受到伤害。其中，著名的民主先驱之一、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陈仁炳先生，成为后来不予改正的五个中央级大右派之一。其余四人在 1978 年之前都已去世，后来也陆续得到实际的平反（例如骨灰进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一定的纪念仪式等）。陈仁炳是五人中唯一的健在者；他只是被摘掉了“右派”的帽子，尽管一再申述，但始终没有得到“改正”，成为五人中仅有的一个直到辞世也没能等到被正式平反的人。

其实陈仁炳和其他四人一样，也已获得（至少是部分获得）了实际的平反。因为他享受了离休干部的待遇，复旦大学后来对他在职称、工资、住房、医疗等方面都安排照顾得很好。但时过境迁，究其一生，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就致力于为国家的富强和民主而奔走呼号；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又投身于为人民的解放和自由的革命斗争，是英勇的民主斗士；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为民主而直言，被卷入反右运动的漩涡；到晚年治学育人，继续为实现民主的社会孜孜不倦。

本文从陈仁炳先生的家庭出身，读书成才，海外留洋，创办杂志，著书立说，参加民盟，卷入整风和反右运动，曲折的平反经历，以及平淡的晚年教书生活等各个方面，试图较为全面的展示他的一生和他一生中最为人关注同时也颇受非议的“民主思想”。他的一生，可说是非凡而传奇的一生。为民主的政治，民主的文化，民主的教育，民主的社会以及民主的革命奔走呼号的他，身上闪烁的关于进步与革新的光芒，值得我们铭记、重视、学习和研究。

关键词：陈仁炳 民主的政治 民主的文化 民主的教育 民主的社会

论文类型：基础研究

TITLE: Study on Chen Renbing's Democratic Thought

MAJOR: History of CCP

APPLICANT: Xiao Shijing

SUPERVISOR: Prof. Hong Xiaoxia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China anti-rightist struggle was moving up in 1950s, lots of Chinese intelligentsia was suffering for this movement. Among those more than 600 thousands of Chinese intelligentsias, Renbing Chen, the forerunner of Chinese democracy, the famous historian and anthropologist, was labeled as one of five top level Rightists. As central committee member of China Democratic League, it hit Mr. Chen heavily. The other 4 people got back their reputation one by one from 1978; Mr. Chen was the only one who holds the Rightist label till his death.

Mr. Chen began to devote all of his life in Chinese development in 1930s, he became the representative of Chinese Democratic Movement in 1940s, and in 1950s he still worked for Chinese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even if he took a severe strike by the Anti-Rightist movement. He persisted in teaching and appealing for Chinese Democracy development in his old age.

This paper is trying to let more people know about Mr. Chen including his family, his education background, three years overseas studying, his work histories, his famous magazines and the corpus just finished before 1949, what's more, it's still showed us about how and why he was involved in the rectification and anti-rightist movements. All his life can be said as an extraordinary and legendary life.

He worked for Chinese democratic politics, Chinese democratic culture, Chinese democratic education and Chinese democratic society all of his life, his story deserves the successors learning and respecting.

KEY WORDS: Chen Renbing, Democratic Politics, Democratic Culture, Democratic Education, Democratic Society

TYPE: Basic Research

目录

摘要.....	I
Abstract	II
引言.....	1
一、研究初衷和研究现状.....	1
二、研究意义.....	3
三、本文结构和内容.....	5
第一章 欧风美雨的洗礼——陈仁炳民主思想的萌芽与产生.....	7
一、牧师家庭熏陶——陈仁炳民主思想的基石.....	7
二、沪江名校求学——陈仁炳民主思想的沃土.....	13
三、远渡重洋深造——陈仁炳民主思想的萌芽.....	16
第二章 抗战岁月的磨砺——陈仁炳民主思想的发展与成熟.....	18
一、加入民主同盟——陈仁炳民主思想的形成.....	18
二、创办杂志刊物——陈仁炳民主思想的发展.....	20
(一) 创办《展望》杂志.....	20
(二) 创办《天风》杂志.....	22
三、发表个人文集——陈仁炳民主思想的成熟.....	25
(一) 《走向民主社会》.....	25
(二) 民主的政治——对外求独立，对内求解放.....	27
(三) 民主的文化——破除封建愚昧，“医治”病态文化.....	31
(四) 民主的教育——拯救扶持国民教育，保护重视知识分子.....	33
(五) 民主的社会——配置社会人口资源，解放妇女儿童自由.....	35
(六) 民主的革命——主张和平民主建国，反对暴力流血战争.....	38
第三章 反右运动的打击——陈仁炳民主思想的争议.....	42
一、质疑整风运动——陈仁炳民主思想受质疑.....	44
二、背离社会主义——陈仁炳民主思想被批判.....	49
三、曲解党派关系——陈仁炳民主思想遭驳斥.....	51
第四章 漫长的平反之路——陈仁炳的晚年岁月.....	57
一、曲折漫长的平反道路.....	57
二、忧郁平淡的晚年人生.....	58
结语.....	60
致谢.....	63
参考文献.....	66
论文独创性声明.....	73
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73

陈仁炳民主思想研究

引言

一、研究初衷和研究现状

从2010年至2011年,通过将近一年时间对中共党史专业的系统了解和学习,笔者对建国初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在导师洪小夏教授的悉心指导和点拨下,决定做关于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陈仁炳教授的民主思想研究。一是身处大上海,这里丰富的文史资源对于挖掘上海这片热土上的人和事提供了便利的平台和广阔的空间。二是上海这个最早打开大门的华东沿海城市,无论是从接受欧风美雨洗礼的程度来看,还是在早期民主思想启蒙运动中取得的成果,在社会变革、制度革新等方面至关重要的地位来看,都是一片丰饶的天地。三是陈仁炳这个人有他的特殊性,无论是对研究中国的民主进程,还是对于后人更好地了解和认识整风反右运动那段历史,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基于此,笔者开始着手了解关于陈仁炳老先生民主思想的研究现状。

查阅了上世纪中期以来的诸多研究成果。发现迄今为止,对陈仁炳的系统研究近乎空白:陈仁炳的传记、年谱等系统研究专著,一本都没有;上海作家叶永烈撰写的几本反右运动的书籍,多数都没有提到他,只有一本一带而过。公开发表的相关研究论文,目前只有中央党校王海波教授的《中国最后一个右派陈仁炳》^①,上海大学徐有威教授的《唾面自干——陈仁炳的晚年》^②,还有彭文应之子彭志一先生撰稿的陈仁炳小传^③等寥寥几篇。陈仁炳的子女,似未像彭文应的子女那样,为自己的父亲编写的文集、纪念集等。因此,有关陈仁炳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资料都十分稀缺,也非常零散。

史料方面,笔者花较大功夫浏览了《文汇报》、《解放日报》等报刊上散见

^① 王海波:《中国最后一个右派陈仁炳》,《世纪》,1995年第9、10期合刊,第14-17页。

^② 徐有威:《唾面自干:陈仁炳的晚年》,《百年潮》,2003年第8期。

^③ 彭志一撰稿:《陈仁炳郁郁而终》,申渊主编:《五七右派列传》,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225-229页。

的陈仁炳文章。还找到了陈仁炳本人 1949 年自编的论文集《走向民主社会》一书，该书收录了 30 余篇陈仁炳关于阐述民主政治与社会革新的文章，基本上是他自己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零散发表在进步刊物《展望》上的文章汇编，是陈仁炳解放前民主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此外，作者还搜集到了由复旦大学校刊编辑室 1957 年编辑出版的《毒草集·批判右派思想言论选辑之一》和《明辨集·批判右派思想言论选辑之二》。这两本集子，收录、摘引了大量陈仁炳等人 1957 年在整风运动中的原话，也收录了反右运动中许多反对、驳斥、批判、揭发他们的言论。这些鲜活的资料使我们能基本还原陈仁炳在整风和反右运动时言谈举止。另外，陈仁炳的父亲、著名牧师陈崇桂，毫无疑问对陈仁炳早年思想性格的形成影响颇为深重，因此在关于陈崇桂牧师的纪念性文章中，笔者也找到了一些有参考价值的文献资料。其中最重要的是由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编辑的《怀念陈崇桂牧师》一书，较为全面地收录了纪念和怀念陈崇桂牧师的回忆文章。特别要提出的是，由陈仁炳和其大妹陈美大（陈崇桂长女）合著的《陈崇桂牧师小传》，以及陈崇桂牧师亲笔撰写的《新加坡脱险记》被作为附录附在了书的最后，这对充实本文的研究参考资料显得弥足珍贵。^①关于陈仁炳的回忆文章，比较少见，仅有贾植芳的《一段难以忘却的记忆》^②等。上述资料构成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基础。

本文希望能把这位历经坎坷、唾面自干的学者重新还原到半个世纪以前，还原其英姿勃发的湖北热血知识青年的身份，还原其一代大牧师陈崇桂后代的身份，还原其颠簸在 1957 年政治潮流风口浪尖上的“逆流者”的身份，来研习陈仁炳早在上个世纪就萌发的中国民主思想，来重新审视他的相关言行和他所表达的关于国家、社会、领导者的真实想法，以便我们能以更加宽容、更加开阔的历史眼光来看待反右运动这场历史的浩劫。是看待而不是评判。因为我相信，无论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时间都会给出最公平的判断。因此，就这个选题来说，研究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这一点给了笔者莫大的信心和动力。当然，作为一名涉世未深的在读硕士生，我想，我的初衷，应是一种自主性、探索性学习方式的推动，这大大不同于本科阶段基础知识的积累性学习，这种求知心和好奇心推动笔者去主动地思考过往，发现真相，还原历史。当然，此外还有一份对先辈，对历史的敬仰和敬畏之情夹杂在其中。

^①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编辑：《怀念陈崇桂牧师》，上海出版印刷公司承印，1992 年 2 月。

^② 贾植芳：《一段难以忘却的记忆》，《上海文学》1991 年第 4 期，第 65-66 页。

研习这个课题，不敢说能起到些许正史的功效，也不敢妄想就能填补历史的一处空白，但求抛砖引玉罢了。即便只能说清楚一个人的一生，能将一个原本支离破碎的故事有头有尾地讲述给大家分享，笔者已经感到无尽的欣慰了！倘若还能唤起一丝一毫大众对此的关注和引来更多优秀的研习者追求，这篇论文也就有了可喜的存在价值。

二、研究意义

经历了辛亥革命前后至今百余年的摸索前行，中国社会正生机勃勃的发展着，各项社会制度都在不断的尝试和探索中进一步完善，同时也暴露出了许多难以突破的瓶颈和局限性。前世不忘后事之师，在民主改革呼声愈浓的当代，正所谓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当今的中国已不再和半个世纪以前，带着种种诸如“专制皇权，复辟帝制，丧权辱国，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等标签的落后弱国同日而语了。随着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右派平反运动的开展，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开化，一届又一届为国为民的领导核心的建立，看到海南三沙市第一次实现人大代表村民直接选举，我好像看到了国家正在走向富强民主的星光大道。回顾历史，以史为鉴，任重而道远。我们深知，只有了解一个文明的前世今生，才能真正了解一个文明本身。中华文明是东方文明的代表，中国探索民主进步的历程虽然不长，尤其是在中国近代打开国门之前，民主进步的步伐一直缓慢又缓慢，常常是停滞不前甚至会走回头路。但是，在起步之后，尤其是国家独立以后，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也是值得其它亚洲国家参照和反思的。

写这篇论文并无意要拿已经过去的属于那个时代特定的原则和标准，来再次抨击历史人物之意；何况是已经辞世的前辈；无论如何，这些历史长河中的点滴身影，或大或小，堆砌出了如今的泱泱大国。更无为某人物翻案鸣冤之想法。对于那一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历史事件，确有值得党史学者深思和研究的必要；实事求是地研究整风运动逆转、反右运动发生和扩大的原因，谁说不是后车之鉴呢！想起一句西方的哲理“存在即合理”。如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所说的那样：“40多年过去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使我们深深地感到，开拓‘民主新路’，打破‘这周期律’，不可能一次完成，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不但今天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完全‘跳出这周期律’。就是在今

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认为也不要再说这个话。任务尚未完成，全党仍须努力！”

^① 重新回到民主这个老话题，揭开历史的伤疤，找到根源的病灶，推动历史的进步，仍是每一个写史之人的初衷。

民主的先驱们已经作古了，但思想的洪流仍然源源不断地汇成大江大河，滋润着后辈们探索与进步的心田！做这样一个课题，研究这样一个经历波折的民主先驱，无论是从正史的历史意义还是推动当代各项民主改革的进程来看，作者认为都具有它独特的价值之所在！

从上个世纪 30 年代开始，出身于牧师家庭的陈仁炳先生就开始致力于中国政治的革新与进步。他的革新进步思想涵盖起来，主要集中在“民主”二字上。从民主的政治，到民主的文化，民主的教育，民主的社会以及中国民主的革命进程，在近三十年的摸索与实践中，他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笔者以为：陈先生的诸多言论与思想足以形成一个独具特色的、较为系统的思想体系，姑且先将其称为“陈仁炳民主思想”，这也正是本文想要向读者表达的主要内容。纵观陈老先生的一生，在其出版的文集，在不同场合发表的各种演说、文章，以及种种的实际行动中，不难看出，他的民主思想从萌发到日趋成熟，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有对社会文化做的动态分析，提出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将会遇到的各种问题，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除了经济和工业之外），有政治变动，政治作风，政治道德，政治运动与道德的力量，民族国家和政府，官僚政治以及对自由主义的思考和超越自由主义的思考。在民主的文化问题中，他解释了什么是“文化病”，阐释如何拯救文明以及启蒙运动的再开始；对于教育，其核心思想仍然是民主，他带领人们窥视了政治缝隙里的教育，阐释了自己对学潮、对解聘教授和开除学生的看法，以及他眼中部分知识分子的愚昧与弱点；对于社会的思考，仍然是以民主为核心，人口、资源、社会制度、人道主义精神、妇女儿童权益、新社会的建制等等，都是他所关心的话题，开放的思想 and 前瞻性的视野，使他不仅为中国的民主问题忧心忡忡，还将中国的民主进程与世界的民主进程联系起来，提出了关于“和战论”、法统论、战犯论等国际主义民主思想。

上个世纪 50 年代，一场席卷全国的整风运动风风火火地拉开了序幕。从 1957 年夏季不可逆转的局势开始，这位曾经的民主斗士一度被推上了反右运动的风口浪尖。这位老牌爱国民主人士、历史学教授，当时，作为民盟上海市委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年，第 613 页。

宣传部副部长的他，因一篇《陈仁炳对共产党整风方法有不同意见》^①的报道性文章，被毛泽东亲自点名，据各大报刊刊登以及1957年复旦大学校刊编辑室编辑的收录右派言论的文集《毒草集》等文献资料考据，陈仁炳关于国家社会，关于政治政策，关于民主自由等方面的主要主张和言论包括：“提倡贾谊治安策精神”，“整风运动鸣放论”，“算旧账论”，“党内干部问题值得特别注意”，“改走另外一条道路论”，“法治观”，“艺术工作者作为公民享有的权利”，“反对领导干部两点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一张桌子四条腿论”，“对民盟组织的性质认识”，“跟共产党作斗争，重磅拳头轻磅拳头的惩办论”^②等，一度成为1957年夏季反右派运动从开始到扩大，各大报刊如《文汇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等报的头版头条，关于他的消息一度占据了报刊消息的半壁江山，引发了许多人对他的争议、不满，乃至批判。被打成右派后，他受到严厉批判，铺天盖地的揭发、批判与控诉接踵而至。

历史虽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历史留给我们的思索和记忆却久久不能逝去。深度挖掘陈仁炳的民主思想，对还原整风运动的历史原貌，反思反右运动扩大化的原因和影响，对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等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三、本文结构和内容

基于上述研究现状和研究意义，本文拟以陈仁炳一生的经历为线索，展示他的民主思想的形成、发展以及变化的过程。思想的洪流离不开生活的源泉，往往那些让人铭记的大思想家们都有着与众不同的人生经历；正是这些生活、教育和工作经历的点滴汇集，才造就了他们奔腾不息的思想洪流。

本文除引言和结语之外，正文主体分为四章：

第一章讲述青少年时期陈仁炳的家庭生活和学习经历。牧师家庭的出身，父亲陈崇桂牧师对他的潜移默化的熏陶，他对基督教的接触和参加洗礼正式成为一名基督教徒，民主思想的种子悄悄的埋在了心底。开放民主的沪江大学以及三年的海外求学经历，为青年陈仁炳打开了一扇通向外面世界的窗口。

第二章是本文的重点。纵向来看，是以陈仁炳成年后的政治思想经历为线

^① 《陈仁炳对共产党整风方法有不同意见(民盟成员在市委宣传会议上的发言)》，《解放日报》1957年6月9日第2版。

^② 《毒草集：批判右派思想言论选集》，复旦大学校刊编辑室，1957年8月，第13-29页。

索：首先是参与创办《展望》和《天风》两本杂志，并以此为平台，唤起更多的进步的热血青年为民主和自由奋斗的激情和决心。《展望》是上海中共地下党直接领导的进步杂志；《天风》虽是上海基督教会办的杂志，但也非常关注时事政治，包括国内和国际形势。接着陈仁炳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并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出版了个人文集《走向民主社会》。本章阐述陈仁炳的民主思想由萌芽产生阶段走向形成、发展乃至成熟阶段的动态过程。横向来看，这一章中包含了本文的核心部分，即陈仁炳民主思想的主要内容，民主的政治、社会、文化、教育和革命六个方面。笔者通过阅读和研习陈仁炳文集和参考大量报刊书籍文献，对陈仁炳民主思想加以提炼和概括总结，试图给读者一个更加清晰明了的印象。

第三章也是本文的重点章节。整体结构上仍然延续第二章，进入到下一个时期即整风与反右运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我将这一时期的标题命名为“陈仁炳民主思想的争议”，包括了三个小节，分别以对于整风运动的不同意见，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态度，对于民主党派地位和民主党派与执政党的关系三个方面收集了陈仁炳对此的主要言论和观点以及当时社会舆论对此的评价和批判。这样第二章和第三章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便于更加直观的将陈仁炳的民主思想全方位的呈现给有兴趣的研习者。这样安排，笔者认为，对于读者对陈仁炳做出更加全面客观的评价是有一定帮助的。

第四章简要交代了晚年陈仁炳的生活和他曲折漫长的平反之路。在回忆录和访谈资料的帮助下，让读者对陈仁炳的晚年生活和工作也有一个了解。平反工作中出现的种种情况，部分参与处理平反工作的人的态度与评价，都为我们研究和评价陈仁炳民主思想提供了参考。

作者深知，想要在一篇短短的硕士论文中详尽展示一个历史人物的一生，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这篇文章将立足点放在了陈仁炳政治思想中最为突出的民主思想上，力求能比较清晰的阐述清楚。还有许多内容没有包括本文之内，本文也有许多不足需要补充。期待本文能为更多的相关研究论著提供一个初步的借鉴与参考。

第一章 欧风美雨的洗礼——陈仁炳民主思想的萌芽与产生

一、牧师家庭熏陶——陈仁炳民主思想的基石

陈仁炳 1909 年 9 月 28 日^①出生在湖北武昌(今武汉)一个并不普通的家庭。他本人后来曾担任过中国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员、上海市民盟委员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秘书长，还是名校复旦大学历史系从事世界史教学与研究的著名学者。但是，在这些众所周知的身份外，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他是中国最早出国传教的著名牧师陈崇桂的长子。正是这样一个特殊的身份，为陈仁炳一生对于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孜孜不倦的追求指引了方向。尤其是青少年时期的陈仁炳，之所以接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熏陶，和他父亲的牧师身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牧师这个职业在西方是一个很普通的职业，但是在中国，即便是在现代中国，在一般人看来也并非是一个普通的职业，而是带着几分神秘的色彩。在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封建迷信思想根基的大国人民眼里，能以牧师为职业的人一定是家境相对富裕，早年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受到了极强的西方思想的熏陶，并且能够深刻理解教会的教义的人。是不中不洋的“假洋鬼子”，是身着奇装异服的洋道士、洋僧人，说不上有什么不好，但总觉得怪异和难以理解，是一种远离普通世俗百姓的职业。但在西方国家人眼里，传教士恰恰相反，他们是西方人认识中国的一群“文化使者”，对那时的中国社会进步思想有很大的影响。^②传教士的信仰及布道的恒心和毅力就足以令人尊敬。奇怪的是，中国虽然是一个有着极强自我宗教信仰的国度，中国的道教、儒教、佛教等深入人心的程度并不比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等对民众的影响小，但中国的传教士却鲜为人见；历史上有记录的除了唐代鉴真等就几乎没有别的人了，中国自己本土的宗教（释、道、儒）几乎没有向境外派出过传教士。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传教士不论在什么时期，足迹都遍布世界各个角落，并且往往带着强烈的政治

^① 陈仁炳生于中秋节，换算成 1909 年，是阳历 9 月 28 日。参见叶永烈《反右派始末》，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年 10 月，第 430 页。

^②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编辑：《怀念陈崇桂牧师》，上海出版印刷公司承印，1991 年 2 月，第 4 页。

色彩。外国人的教会信仰如同中国人的封建迷信一样，都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传统。

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国家获得了在中国内地建立教堂的权利，这一条约无疑对西方在华传教活动打开了一道大大的门户；于是，如雨后春笋般的传教士们开始了他们在中的真正的传教生涯。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间，英国伦敦教会传教士杨格非和他的同伴们一起从上海出发，来到了湖北的武昌，成为第一个入驻这里的基督教传教士。他们首先在武昌和附近的县开展了各种简单的传教活动，就此以武汉为中心在华中地区展开了如火如荼的传教活动。后来，美国基督教行道会于19世纪80年代初来到武昌，开始传教活动。紧接着，瑞典基督教行道会（1878年成立）也在武昌建立了新的传教基地。^①

陈仁炳的父亲陈崇桂，祖籍湖北孝感石头埠。其曾祖父曾是个非常有钱的地主，后因跟人打官司变卖了全部田产，并死在了狱中；其祖父在家庭沦为赤贫后，在家乡无法生活，只好流落到汉口当学徒，学制木桶、木盆。后在汉口开个小店，两个儿子也继承父业，以维持生计。陈崇桂的父亲是家中长子，但到他主持家政时，生意已经萧条，被迫关了小店，全家搬迁到江南的武昌。1883年1月29日，陈崇桂出生于武昌。此时家境贫寒，其父是无固定收入的箍桶匠，每日挑担上街，走街串巷，为人修理木桶、木盆。其母亲则给人帮佣，补贴家用，经常在一些相对较富裕的家庭做零工杂活。其父瞒着祖父，加入了美国圣公会，成为当时在武汉地区还比较少见的一名基督徒。为此常受祖父责打；但他非常恭顺，逆来顺受，孝敬父母，给陈崇桂以深刻印象。陈崇桂是家中次子，小名“小茗”，即小傻瓜之意。1889年，刚满6岁的他进入武昌一所行道会创办的免费教会小学读书。每天除了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外，还在兼任传教士和老师双重身份的教员督导下，学习英文、数学、西洋史等基本课程。在这样的教会学校，学生不仅能学到文化知识，还能学到许多关于西方基督教义相关的知识，比如读新、旧约圣经。另外，学校还会组织他们定期参加校内组织的礼拜和聚会等活动。在老师眼里，幼年的陈崇桂不仅很聪明还特别热衷于学习，学习成绩一直非常不错，很招老师们的喜欢。^②1890年，陈崇桂7岁的时候，母亲转到武昌县华林瑞典行道会牧师韩宗盛家当佣人，常随从韩牧师的太太韩师母一起去教堂做礼拜，有时还带着年幼的陈崇桂一起去；后来母亲受洗加入

^① 彭鲁博文：《陈崇桂：中国传教士去境外布道第一人》，<http://blog.sina.com.cn>，2012-07-01。

^②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编辑：《怀念陈崇桂牧师》，第5页。

了瑞典行道会；少年陈崇桂也深深爱上了做礼拜这项西方国家特殊的宗教活动。他喜欢扮作“讲道牧师”，举止端庄，俨然是个小牧师。由此开启了陈崇桂与基督教的不解之缘。

在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教会学校学习的经历，为少年陈崇桂开启了思想的大门，他不再是一个学习四书、研读五经的中国传统少年。1899年，当陈崇桂年满16岁、从教会小学毕业的那年，他正式接受洗礼成为一名瑞典行道会教徒。1901年，年满18岁的他被行道会送入武昌博文中学继续读书。武昌博文中学由英国循道宗宣教士W. A. T. Barber创办，学校主要以培训英语方面的人材而远近闻名。从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一般都有很好的出路，有的选择继续升学深造，有的则服务于邮局、海关或洋行等“金饭碗”的企业机关就业。陈崇桂在该校学习时，每门功课几乎都考全班第一，成为校长任修本牧师（Rev. G. G. Warren）的密友。他1904年顺利从博文中学毕业，到武昌的瑞典行道会圣经学校教英文，因收入太低，一年后他辞职进入一所公立学校教英文，同时在几个富人家做家教教授英文，补贴家用。陈1905年结婚，但妻子周艳春次年就意外去世，使陈崇桂非常难过，甚至想轻生。1906年10月，武昌教会邀请江苏的李叔青牧师前来布道三天。陈崇桂不仅听了他的讲道，还亲自前去拜见了。听了李叔青牧师的劝导，他感动极了，立志要献身基督，做一名专职的传道人。尤其是1907年冬，陈崇桂读了《乔治·慕勒传记》后，决定放下一切，奉献自己，专职传道。此时他回到瑞典行道会办的武昌圣经学校教英文，并不顾家庭的反对，辞去了做英文家教的兼职。这一年，陈崇桂还碰到了后来的妻子李哲映。李也是一名教徒，毕业于江西九江的教会中学，但到遥远的鄂西老河口教过五年书，是个心地善良、信仰虔诚、有奉献精神的姑娘。李叔青鼓励陈仁炳要振作，他们很快订婚，并于1909年初结婚。

1908年，瑞典行道会决定和美国行道会合作，在长江中游的湖北荆州药王庙开办了一所神学院，并将武昌圣经学校合并过去，以美国行道会传教士李真（译音）为校长，由陈崇桂和其他几位年轻牧师担任教员。其中陈崇桂负责学校具体筹建工作，不仅包括教学工作，还包括行政工作，双重责任。1909年春，陈崇桂离开武昌，前往荆州。同年，他的长子陈仁炳出生了，给这位热心传教的教徒的生活平添了莫大的欣喜与乐趣。“人自己不能上升成为灵；所以神的儿

子降下来成为人，人接待祂，与祂联络，祂的生命就贯于我们之中”。^①陈崇桂在布道教义中多次提到人和神灵的关系，觉得儿子就是上帝赐给他的福音。

从1909到1925年，陈崇桂一直在荆州神学院担任教学和教务管理工作，长达16年时间（其中出国布道2年，国内讲学2年，在荆州实际生活12年）；他教授科学、哲学、神学、教会史、中国史和世界史等各科课程；他刻苦自学，提高自己的英语和瑞典语水平，并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以及《东方杂志》、《教育杂志》等各种书刊，使其在神学和知识等方面都获得巨大进步，将自己由一名中学毕业生提升为一名合格的神学院教师。^②他还创办了一所神学院的附属中学荆州中学，初高中两部六年制，为各地教会学校培养中小学师资。值得一提的是，1919年“五四运动”爱国反帝风暴席卷全国，荆州中学的学生联合其他学校的学生组织了荆州学生联合会，举行了声势震动荆沙一带的示威游行；他们抵制和查封日货，拒乘日轮，以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犯我国领土主权，反映了时代要求。

1919年至1922年，陈崇桂曾前往美国和瑞典作旅行布道。其中于1921年进美国伊利诺斯州的惠顿学院（Wheaton College）进修一年，攻读神学和希腊文，1922年毕业，获得文学士学位，是该校第一位毕业的中国留学生。此行他用瑞典文和英文写了一本书《中华之声——我的自传和演讲》，在瑞典和美国同时出版发行。欧美之行后返回荆州，陈崇桂晋封牧师教职；随后两年，他又去中国各地布道传教。由于知识渊博、对神学的造诣较深，又能用英语和瑞典语布道讲学，他被誉为中国第一布道家，深受信众尊敬。这些经历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看来，都是非常难得和珍贵的，为陈崇桂的西化主义、人文精神、宗教事业拓展了更加宽广的道路。在中国，历来只有外国的传教士到中国来传道，而中国传教士到境外布道则自他开始，他是中国传教士去境外布道的第一人。

1925年6月底，陈崇桂因荆州神学院的外籍教师、教务长、院长等操纵校政，歧视中国教牧人员，气愤提出意见而被迫辞职。陈崇桂在荆州神学院任职的16年间，为湖北的基督教行道会和其他省的教会培养了不少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教牧人员。随后的两年，陈崇桂接受基督将军冯玉祥的邀请，前往张家口，在冯玉祥的国民军中担任“随军宗教工作组”总干事，领导冯军中的随军牧师

^① 陈崇桂：《不重生就不能活在神的国裏》，华人基督教查经资料网站，旧恩与信仰目录之——重生 <http://www.ccbiblestudy.org>。

^② 在荆州，“幸我有权利可以排功课，支配教员，我想学哪门课，即派自己教那门课。十二年中任何功课我都教过。……可以说十二年我在荆州等于读了高中和大学。我的英文、瑞典文、圣经、神学、国学，皆是在荆州立了根基。”转引自陈仁炳、陈美大《陈崇桂牧师小传》，《怀念陈崇桂牧师》，第79页。

50 余人，开始在军队中的传教布道工作，并帮助冯玉祥在张家口办了一所弘道学院。1927 年冯玉祥下野去苏联后，陈崇桂避居内蒙古小镇萨拉齐；为躲避张作霖的通缉，他在萨拉齐的瑞典教堂、孤女院和外国传教士家中的夹墙里躲避了大约 4 个月，每天撰写“修灵日新”。同年底辗转到上海，任中华布道促进会总干事，创办《布道杂志》。

1928 年 10 月，陈崇桂前往长沙，到湖南圣经学院教书，并继续主编《布道杂志》。每日教书、编辑《布道杂志》，周日在长沙各教堂讲道，寒暑假到全国各地及港澳地区讲道。他在湖南圣经学院工作了 8 年，直到 1936 年底离开。翌年抗战开始，他逃难到四川，继续独立自办《布道杂志》，在艰苦的环境下坚持出刊、传道。1941 年底他应邀去新加坡、马来西亚讲道；抵达后 4 天，即碰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新加坡。陈崇桂被迫滞留新加坡达 2 年之久，与外界隔绝。当时在新的英美传教士都被日军关进集中营，但陈崇桂侥幸逃脱，住在一个小山上；虽然几次受到日军审讯，但未受到严重伤害。在新加坡隐居的 2 年，他无法讲道，便撰写了大量讲道稿，并学习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两年后在教友的帮助下，逃离虎口，经泰国和越南，辗转回国。他 1943 年底回到重庆，1944 年创办了一所神学院，不属于任何外国教会流派，专门培养中国的教友和牧师；先在宜宾，后迁重庆。他担任院长兼教授，并复刊了《布道杂志》。

1948 年 9 月，陈崇桂夫妇曾应邀到美国、加拿大、英国和瑞典访问。在美国访问期间屡次接受记者采访。当被问到对中国内战的态度和结局时，他多次表示因为中共代表穷人，所以中共一定会取得内战的胜利；他主张美国应对国共内战守中立，断绝对国民党的援助。1949 年 3 月他离开美洲，前往瑞典，用瑞典文讲道，受到热烈欢迎。后顺访英国，再经欧洲、印度、香港，于 1949 年 6 月回到重庆。陈崇桂继续办重庆神学院。重庆解放后，他表示支持中共的领导，拥护人民政府，1950 年应邀出席第一届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不久当选为重庆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一任主席。1951 年他解聘了重庆神学院的 8 名外国教师；并当选为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该机构设在上海）副主席。1953 年因身体不好，辞去重庆神学院院长职务（重庆神学院一直办到 1958 年才停办），移居上海。1954 年到北京参加中国基督教第一届全国会议，当选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同年还当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6 年迁居北京。

陈崇桂晚年在基督教杂志《天风》和其长子陈仁炳参与创办的《展望》杂

志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如 1953 年到 1956 年年间,他先后在《天风》发表了《爱国爱教两全其美》、《我政治思想改变的过程》、《努力三自革新》等文章,支持三自运动,拥护中共领导。这些文章也为陈仁炳民主的文化中宗教信仰自由提供了思想之源。1954 年他还为当时的基督教出版机构“广学会”写了《布道六讲》和《培灵十讲》两本书。出版后很快销售一空,广学会只得再版供应。1955 年上半年,陈老牧师应邀在《天风杂志》上撰写“每日灵修专栏”,也极受读者欢迎。

1957 年 3 月 19 日,陈崇桂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言,题为“保护宗教信仰,尊重宗教信仰”。他根据他去某些地区视察所了解的情况,对某些地区的干部违反宗教政策的错误提出批评。这篇发言的话讲得比较尖锐,可用心是善良的。但没有想到,在不久之后的反右运动中,他因此而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从此他闭门家居,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1960 年底,中国基督教第二届全国会议在上海召开,陈应邀来上海参加会议,但未发言。这次会上,他当选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常务委员。1963 年他的健康情况恶化,于 3 月 8 日离世。去世之前的 2 月 24 日,右派分子“帽子”终于被摘掉,算是给了他一点安慰。1979 年他的“右派”问题才得到彻底改正。^①

陈崇桂一生热衷于宗教事业,对从小耳濡目染的陈仁炳内心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幼年的时候,受家庭环境的熏陶和影响,陈仁炳的选择和父亲一样,也去教会小学学习;1925 年去北京,就读于基督教美以美会创办的北京汇文中学。陈仁炳从少年时代就对父亲的传教事业非常理解和支持,从小对于西方文化的多次接触与向往,也为这个还未形成自己独立思想的青春少年提供了滋养民主精神的温室。可以说,幼年的生活和父亲职业生涯的影响,是陈仁炳民主思想的早春时代。这一时期,陈仁炳并未形成独立的民主思想。但隐约中,在父亲的影响下,在关于宗教信仰的自由选择,关于万物生灵的态度,关于众生平等的观念,关于争取和保卫公民保卫普通老百姓的个人权利和自由意识,关于反对残暴的帝国主义对弱小国家的无情侵略,基督教徒的爱国主义精神,宗教事业的独立自主精神等方面,都在少年时代的陈仁炳心目中逐步萌芽,渐渐滋生。这些不断宣扬的民主的观念和逐渐传播的独立精神都给幼小的陈仁炳留下了深

^① 以上除另注外,主要参考陈仁炳、陈美大《陈崇桂牧师小传》;王典昌,雷渊澄:《陈崇桂》;沈德裕:《回忆敬爱的陈崇桂老牧师》。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编辑:《怀念陈崇桂牧师》,第 68-117、1-9、10-13 页。

深的影像。^①

二、沪江名校求学——陈仁炳民主思想的沃土

20世纪20、30年代的上海，思想和文化都相当活跃。尤其是在文学和艺术方面。那十年间，海派文学的活跃几乎支撑起了整个中国二、三十年代的文化框架。那是一个民主主义、民主思想，或者说对于民主一词的概念整体萌发的时代，一切关于天下兴亡，关于国家采用何种政治政体的，关于普渡众生的民生教育，关于文艺学术的，关于传统与生活习俗的变化更加地显而易见！看不完的繁华如梦，说不尽的风流传奇，十里洋场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豫园外滩人头攒动，无论是繁盛的本土文化还是新奇的异国情调，都争相绽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种思潮层出不穷，风起云涌！这样的大背景构成了一个上海文化的争奇斗艳的景观箱。^②1928年，陈崇桂从西北来到上海之时，受到过极强的西方开化民主思想熏陶的青年陈仁炳正值高中毕业，遂进入当时名噪一时的教会大学沪江大学开始了大学的求学生涯。

1900年，在江苏传教的美南浸信会和浙江传教的美北浸礼会的传教士们，为躲避义和团，都来到上海避难。热衷于传教而以教育为副业的传教士们，决定在上海联合创办高校。于是在1906年，美南浸信会首先创建了浸会神学院；1909年，美北浸礼会开设了浸会大学堂；1911年两校合并，定名为浸会大学，校址在沪东军工路。1914年，确定中文校名为沪江大学。自从建校以来，一直由美国人担任校长，在执教理念和办学风格上也和很多西方国家的大学如出一辙。

在收回教育权的风潮中，沪江大学被迫改组，增加了华人校董，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年轻博士刘湛恩，于1928年成为沪江大学第一任华人校长。刘湛恩出身于湖北阳新县山区的贫农家庭，靠半工半读、勤工俭学和考取官费生才完成学业。生活非常简朴，经常穿一身蓝布长衫。从不对学生们疾言厉色；只要有时间，就和学生们一起吃午饭，聊天交流心得体会，丝毫没有校长的架子。他还专门设置了奖学金和助学金，让那些和他一样家境贫寒、勤奋好学的孩子能有一边读书一边做工的机会。在他的引导下，沪江大学形成了特别优良的风气，不管是来自于贫困家庭的孩子，还是有显赫家庭背景的富家

^① 陈崇桂：<http://zhsw.org>。

^② 倪锡英：《30年代上海的市井文化》，《文汇报》2012年3月9日。

子弟，大家都以礼相待，不可有等级观念和歧视同学的现象发生。^①在沪江大学，陈仁炳和很多学生一样，沐浴在校园民主团结和谐的校风中，快乐的学习、成长。

沪江大学的一点一滴滋润着在这里上学的每一个学生的心田，他们享受着这份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也滋生了对民主和谐的未来社会的渴望与憧憬。推己知人，渐渐地，在沪江大学，学生之间有了问题要互相求助，教师们也会尽力相帮，逐渐形成了一种互助互爱的良好风气。由于受师生间的这种感情影响，学生之间也充满了互助友爱的精神，新、老学生之间，年级之间，班与班之间，大家都是沪江人，大家也都一视同仁，不厚此薄彼。甚至沪江附中的学生也经常与大学部同学在一起活动、学习。沪江大学互助互爱之风在青年陈仁炳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沪江大学是整个中国当时总计 13 所基督教大学中最先提倡男女同校的学校（1921 年开始招收女生），从这一点上，的确是开了一时风气之先。作为教会大学，沪江大学学生的英语水平较高。美籍教师 Mrs. Marshall 开设的英语会话课，为了更好地授课，她精心编写了适合在多种场合下使用的会话讲义。在教《宴会讲话》这节课期间，她首先请了男女同学各两位走到讲台前，临时配成两对夫妇，分别充任宴会上的男女主人和男女宾客。这在现在看来非常正常的教学方法，在那个思想还饱受禁锢、未曾开放的年代，台下同学觉得一时难以理解，吃吃笑个不停；而站在台上的同学则更加紧张，窘态百出。整个课堂，充满了轻松之感和笑声，大家觉得新鲜无比也兴致盎然，这被当时传为流行的佳话。陈仁炳在这里接受了最早的关于男女平等、关于女性权益方面的教育，这一部分构成了陈仁炳后来民主思想中重要的一章。

沪江大学的学生课余活动十分丰富，校内有很多学生自己组织的社会团体，当时称作“团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兴趣小组”或者“社团”了，例如书法研究会、健美学会、口琴会、英美文学会、英文剧社、女子体育促进会、网球队、排球队、足球队、男女篮球队、田径队等。“团契”中不仅有来自于各种不同专业背景的教员，还有刚刚入学的年轻学生，他们相互之间相处的非常融洽和愉快，就像一家人一样，为校园文化增添了强烈的家庭色彩。以这样的小社团活动小组为平台，学生们在文体德智体美劳等方面都得到了比较全面的锻炼。陈仁炳在沪江大学读书期间，曾任该校基督教青年会会长。他爱好文艺，多才

^① 周川：《刘湛恩与沪江大学》，《上海高教研究》，1992 年第 4 期。

多艺，会弹钢琴，会作曲，在沪江参加了学生剧团，曾登台演出话剧《少奶奶的扇子》。

刘校长不仅是一位积极向上、民主开化的教育家，还是一位热心国计民生，热心政治的爱国者。他提倡“沪江大家庭”应该是开放的，而不是闭门造车的，提倡因材施教。在这里就学的学生能自主的选择自己擅长或者感兴趣的“小团契”开展各项活动，并不强求每一位学生达到标准化的各项指标，在沪江大学丰富多彩的学科设计和课外活动为学生们提供了自由成才的优良环境，以兴趣为主导，可说是素质教育的典范！

此外，在华各基督教大学中，沪江大学是最早开展社会工作的学校。1913年，沪江大学在上海眉州路创设了一个机构——沪东公社，宣传基督教教义，兼办社会福利和社会教育，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志愿者服务中心。刘湛恩出任校长后，沪东公社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工人区为工人及其子弟创办幼儿园、中小学和夜校，还开办了医院和便民诊所，免费为工人和附近的农民施医送药。1932年，沪江大学在圆明园路创办商学院，称作城中区商学院，除本科外，特设专科和普通科，均用夜大学的方式授课，为在职职工、贫寒好学的青年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当时上海一所有名的商学院和夜大学。

沪江大学这些社区服务的良好理念向大家展示了一个民主自由、和谐互助的社会雏形。在陈仁炳后来论述关于民主的社会一章时，谈到关于妇女，儿童，关于民主的社会教育等各个方面，我想，他的民主思想的萌发和强化，一定和他曾生活在沪江大学这样一个优秀的氛围中密不可分。

刘湛恩还是一位爱国者。他曾说：“我生平教导学生应为祖国献身，自己就应当以身作则，做出榜样。”^①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刘湛恩被推举担任上海各界人民救亡协会理事、上海各大学抗日联合会负责人、中国基督教难民救济委员会主席。为了宣传抗日，支援前线，救济难民，他组织教职工安抚流亡学生，做了大量的工作。刘校长特别担心自己的学生们只知到关注自己、关心自己的家庭而不知道关心自己的国家和整个世界。他认为：大城市里的学生，特别是在外国租界里生活的学生，应多到祖国内地去看看今天真正的中国是怎样的。所以他总是告诫学生们一定不能“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另外，他们还经常邀请爱国学者、社会上的一些名流来校演讲，让同学们增加见闻，胸

^① 《沪大首任中国籍校长刘湛恩：一腔热血化碧涛》《新民周刊》，2006年10月18日 <http://www.sina.com.cn>

怀祖国。他曾说“沪江精神是积极的、前进的、建设的、牺牲的”^①。能有机会来这里求学的，都是时代的宠儿，是早期接受良好西方文化熏陶和洗礼的栋梁之才！^②开放的、进步的、民主的、友爱的、团结的、多元化的、集社会责任与担当于一体的沪江大学，使年轻的陈仁炳吸收了先进开化的博爱观、民族观，甚至宽和友好的世界观，这里是陈仁炳民主思想萌发最坚实的沃土！

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期间，正在沪江大学读书的陈仁炳和同学一起亲自赶到第一线，抢救伤员和难民。这些学习和社会实践的经历，为陈仁炳后来撰写《论政治缝隙里的教育》、《论学潮》、《教授聘用制度》等论文，以及反对封建式的教育，反对愚民式的教育方式的质疑等观念，提供了生根和发芽的优良土壤！陈仁炳和其他的同学一样，常常能在享受陶行知、冯玉祥、刘湛恩的夫人刘王立明等诸多教育家、社会名流来校作的报告中，领略到大师治学的风采，也能领悟出许多新的关于人生、关于社会、关于国家兴亡的哲理。可以说，沪江大学是一所民主开化、开放自由式教育的大摇篮！^③陈仁炳在这片开化的土地上学习的四年时光，是通向他一生所追求的民主之路的一扇明亮的窗口！

三、远渡重洋深造——陈仁炳民主思想的萌芽

在沪江大学的沃土中滋长的民主的种子渐渐萌发，伴随着1932年后赴美留学，远渡重洋，近距离的国外学习与生活的经历拓展了青年陈仁炳革新的视野。

1932年陈仁炳从沪江大学社会学系毕业，9月便去美国，开始了他的海外留学生涯。第二年，他顺利获南加州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1936年秋又顺利获得密歇根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将近五年的国外求学生涯，让他第一次走出国门，重新审视和思考着关于中国社会、中国人民的未来道路。

陈仁炳去美国深造的那几年，并不是美国经济繁荣的年代。虽然，从1920年起，美国就开始进入到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这一时期，它也正式顶替英国，开始成为世界的新霸主。1923—1929年，正值美国共和党人柯立芝执政时期，这段时间，社会经济发展相对稳定，后来有学者也把它叫做“柯立芝繁荣”时代。虽然经历了一次世界大战的洗劫，但在这次大战中大赚一笔的美国，在战

^① 《“沪江大家庭”对于和谐校园建设的积极意义》，《上海理工大学学报》，2011-03-19。

^② 陈仁炳：《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变迁》，《沪江大学月刊》第21卷第2、3期合刊（1931年），第61-74页。

^③ 本节对沪江大学的介绍，除另注外，还参考刘王立明（刘湛恩夫人）《沪江大学始末简记》，全国政协文史委编辑：《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年10月，第120-135页；王立诚：《美国教会高等教育在中国：沪江大学个案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1995年。

争结束后并没有像德国、日本那样经济溃退，也没有发生多少生产下降和通货膨胀现象，相反，却以此为契机较早地摆脱了 1920—1921 年的经济危机。但 1929 年以后，美国却正在经历着一场世界性的大萧条，鲜明的对比仅仅发生在短短的几年间。这次经济萧条的惨状比任何给世界带来的重创都要深远得多。

显然，经济作为社会的基石，直接影响到了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体系制度，许多国家纷纷以关税的形式强化了经济的民族主义，经济的大萧条导致了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也是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和不平等主义。另一个惨烈的后果是它激起了作为共产主义替代物的浪漫-极权主义政治运动（如德国纳粹），他们将国内无法解决的矛盾迅速转移到国外，企图混淆民众的视野和判断能力，他们企图宣扬民族优劣种族歧视观念，肆意践踏其他民族的自由和民主。中国的抗日战争，就是在这样的大世界背景之下发生的。

陈仁炳的留学生涯正处在这样一个大时代背景之下，在如此近距离的触摸和感知西方文化的同时，他和美国、和世界一起从这场经济大萧条中，看到的是无视民族尊严的歧视和践踏带来的恶果，看到的是全世界人民对自由和民主的殷切渴望。在美国，他关注国内形势的发展。1936 年夏天，他曾在一次集会中，严词批驳日本政客贺川富彦为日本侵华辩护的演讲，并率领当时在场的中国留学生全体退出会场，以示抗议。在美国，深受英美民主政治的影响，他的整个思想已经俨然被西方的关于民主和自由之观念全副武装。他晚年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上课时，有时会突然离开书本，眉飞色舞地大谈美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谈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罗斯福新政的故事。^①这显然和他留美 5 年，在思想上打下的深刻烙印有关。这一点也体现在他平时的为人处世和探讨问题之中。和别的专家大多喜欢就事论事不同，陈仁炳常能从普通的实践中以小见大，升华到宏观的政治学方面的观点，让人觉得耳目一新，臣服于他。可能正是因为陈仁炳与众不同的视角和观点，后来 1957 年在《解放日报》刊载的《陈仁炳对整风方法有不同意见》发言稿，引起了中央的高度注意，被毛泽东亲自点名，从而造成他晚年“右派”不予平反的悲剧！

^① 徐有成：《唾面自干：陈仁炳的晚年》，《百年潮》2003 年第 8 期。

第二章 抗战岁月的磨砺——陈仁炳民主思想的发展与成熟

一、加入民主同盟——陈仁炳民主思想的形成

陈仁炳是在他的小姨李文宜的介绍和引导之下于1945年8月^①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的。李文宜不仅是陈仁炳最小的五姨妈；还是中共五老之一董必武的学生；她还有一个身份，是中共早期领导人罗亦农的遗孀。1926年入党的李文宜，是民盟的创始人之一；在她去世以后，被评价为“我国妇女运动先驱者和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民盟“杰出的组织者”。陈仁炳从小就和这个比他大不了多少的五姨妈感情特别深厚，她是他见过的第一位共产党人。1989年12月15日庆贺陈仁炳八十岁寿辰时，年事已高的李文宜女士坐在轮椅上从北京飞到上海为外甥庆祝生日。1990年陈仁炳去世时，她又特地从北京发来传真唁电，对这位外甥表达了最诚挚的致意和深切的怀念。^②

陈仁炳加入民盟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仅积极工作还努力进取，政治表现相当不错。其实按照陈仁炳在解放前后的政治表现，他是有资格成为民盟中央委员的。早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期间，正在沪江大学读书的陈仁炳就亲赴前线抢救伤员和难民。时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他又积极参加抗战，和共产党员刘季平等组织抗战教育研究会，进行抗日宣传。后又抛弃华中大学的教职，告别家庭，率领进步文艺团体“武汉合唱团”，赴香港、南洋等地宣传抗日，募集钱款支援抗战。合唱团从1938年12月起，在南洋各地巡回演出达16个月之久，南洋各大中文报刊几乎天天刊登合唱团领队陈仁炳的抗日救国演说辞。他们共筹集抗日捐款1150万元，相当于马来西亚全体华侨每月捐款的四倍多，或相当于世界五大洲华侨平均每月捐款的一倍多，是一个筹款成绩特别辉煌的文艺团体，对中国抗战做出了突出贡献。作为领队，陈仁炳功不可没。1940年返回重庆后，财政部长孔祥熙发现陈是个人才，拉他加入国民党，拟委以重任。但他拒绝了，宁愿跑到偏僻的四川璧山在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当一名教书匠，兼任《中国建设》杂志主编。抗战胜利后，他参加了民盟，积极投入了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在解放战争期间，他多次不顾个人安危，发表演说，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担任中共上海地下党直接领导的进步杂志《展望》

^① 叶永烈：《反右派始末》，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第430页。

^② 徐有威：《唾面自干：陈仁炳的晚年》，《百年潮》2003年第8期。

周刊社副社长，发表文章，抨击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呼吁民主，反对内战。他曾联合上海的多位教授，走访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用英文慷慨陈词，指责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完全错误的，美国扶植国民党政权是没有前途的。这些活动使得他在上海乃至全国范围内赢得了“民主教授”的美誉。

建国后，陈仁炳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作为民主党派代表，他曾上海市区联席代表会议上慷慨发言，对人民政府镇压反革命的号召和上海市二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严厉镇压反革命的决议表示热烈的响应。

但是，他也有觉得不如意的地方。例如，1949年11月15日至12月20日民盟一届四中扩大全会在北京举行，陈仁炳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对民盟的中央领导层人选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民盟内部论资排辈，一些有救国会背景的人取得了较多的位置，而如陈仁炳这种没有背景的成员几乎没什么机会，这引起了他的不满。在一次^①周恩来会见民盟与会代表时，陈仁炳从后面向周恩来递上了名片以及一张条子，条子上写有“请照顾方方面面”的字样。周恩来回头问是谁递的条子，他旁边的民盟中央副主席李文宜女士当时就指了一下陈仁炳。结果在这次会议上，陈仁炳当选为新一届民盟中央委员，这成为他进入中国政坛，至少是中共统战政坛的起点。正是因为这一起点，使得陈仁炳至少在上海政协的舞台上风光了八年，直到1957年反右运动风云突变，导致以后23年的身败名裂，这个结果自然是陈仁炳意料不到的。这位辉煌的民主先驱由盛转衰的转折点，笔者在下一章再详细介绍。

1949年11月5日^②傍晚。北京，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和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会见参加民盟一届四中扩大全会的全体代表。据陈仁炳回忆，当时毛泽东面带微笑地和每一位代表握手致意，随后他称赞费孝通一家三兄弟都为人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和曾国藩的孙子曾昭抡叙旧说起“湘”情；为坐在左右侧的张澜和沈钧儒倒茶；在会见结束后站在门口目送代表远去，直到看不见时才回去。这是陈仁炳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受到毛泽东接见。当天晚上，陈仁炳激动得整夜都没睡着。陈仁炳觉得，肯定不是他一个人，而是还有其他许多代表同样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样是激动得一夜都没睡着。此时的陈仁炳，对共产党、对毛泽东，十分敬佩。

^① 这天应是1949年12月6日。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16页。

^② 徐有威《唾面自干：陈仁炳的晚年》，《百年潮》2003年第8期。

二、创办杂志刊物——陈仁炳民主思想的发展

（一）创办《展望》杂志

抗战胜利后，陈仁炳离开璧山，回到上海，历任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社科系主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文学院院长。1947年，他加入中共支持的“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并任“大教联”干事。此时，他更重要的工作是参加中共上海地下党直接领导的进步刊物《展望》周刊的编辑工作，并出任副社长

抗战胜利后，民盟总部从重庆迁到南京，在南京的几位青年盟员想办刊物，由盟员陈仁炳出面，向国民政府内政部申请登记，取得“京警图字第129号”登记证，刊物定名叫《展望》。《展望》杂志创刊号出版于1947年10月7日；法人代表陈仁炳，编辑罗涵先，出版发行人尚丁；经济方面全仗章乃器、施复亮几位募集；社址在南京大悲巷大高里一号二楼；虽然社址在南京，刊物却是在上海编印出版的。创刊号有施复亮、张东荪、章乃器等著名民主人士的文章。这期出版时，局势已经很紧张，国民党政府在全国各大城市对民主人士和大专院校进步师生进行大逮捕，并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民盟总部被迫解散。严重恶化的局势，迫使杂志社工作人员紧急疏散，杂志也就夭折了。

1948年4月9日，国民党政府以“为共产党宣传”的罪名，查禁了已存在17年的中华职教社机关刊物《国讯》周刊。中华职教社领导人黄炎培想寻找机会创办新刊。但在国民党专制的年代，当局勒令停刊易，文人再办新刊难，因要直面国民党对新闻出版的百般钳制。此时，职教社社员、黄炎培的秘书尚丁提出新的建议：罗涵先、陈仁炳、陈新桂等人办的《展望》杂志，只出过一期便停刊了。是否可以利用这个刊号？黄炎培闻讯大喜过望，决定由中华职教社参与，接办或合办新《展望》。4月22日，黄炎培邀集杨卫玉、俞寰澄、罗涵先、陈仁炳、盛丕华等召开预备会，指定俞寰澄为《展望》周刊社社长，自己和陈仁炳担任副社长，杨卫玉担任编委会主任，江问渔、施复亮、孙晓村、尚丁、罗涵先、陈新桂等15人为编委，尚丁负责经理事务，主持出版发行和行政工作。为了对付国民党的检查，社址表面仍在南京，林森路261号（罗隆基的女友浦熙修的家，所以罗隆基实际也是一个参与者。后浦、罗两人都被捕），在上海仅设一个“3040号信箱”的发行所。其实刊物完全是在上海编辑、印刷、出版的，是个地下出版物，真正的社址在南京西路大华商场里的一间小阁楼里。

1948年5月1日出版的新《展望》，为了掩人耳目，编为第2卷第1期。其报道解放战争进程的“军事一周”栏目，特别受到读者的欢迎。

黄炎培向上海地下党要求，派人参与并实际负责《展望》的工作。同年9月，王元化受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派遣，进入展望杂志社，担任编委并直接负责日常编务工作。王元化的加盟，提高了《展望》的档次，该刊设置了五个引人注目的栏目：“一周国际展望”、“一周政局展望”、“一周经济展望”、“一周战局展望”和“周末专栏”。其中“战局展望”和“政治展望”都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撰稿，格外受到读者的欢迎。该刊的发行量很快飙升到5.3万余份。这个引人注目的杂志，成为国统区里中共唯一掌握的宣传阵地，在国民党的压迫下，勉强支撑出到3卷18期，于1949年3月19日再次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后在上海解放后三天便又迅速于6月1日再次复刊）。^①

陈仁炳以及父亲陈崇桂都在《展望》上发表过多篇文章。如在《论政治隙缝里的教育：为教师节作》（《展望》1948年第2卷第17期）、《北方在变！》（《展望》1948年第2卷第14期）、《论官毒——官僚政治与民主政治之消长》（《展望》1948年第2卷第7期）、《再论和战》（《展望》1949年第3卷第12期）、《革命只有一个》（《展望》1949年第3卷第18期）、《解放妇女》（《展望》1949年第3卷第16期）、《论政治道德》（《展望》1949年第3卷第15期）、《论政治作风》（《展望》1949年第3卷第13期）、《逆流与合流：七七第十一周年的形势》（《展望》1948年七七增刊）、《关于解聘教授与开除学生·读报偶笔》（《展望》1948年第2卷第12期）、《论知识份子的天真》（《展望》1948年第2卷第5期）等。这些文章都大致阐明了陈仁炳对社会、对国家的民主与进步的思考与畅想，具体内容在后面的《走向民主社会》节里再具体阐述。《展望》杂志是陈仁炳抒发其政治思想、民主思想的重要平台，其思想在《展望》杂志的阐发中也不断发展而走向成熟。《展望》不仅仅是一本杂志，我想，也寓意了一种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期许和“展望”；中国的有志青年对明天的向往和憧憬在这里发芽、开花。因为《展望》杂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熟知这位在牧师家庭长大、有着多年海外留学经历的青年学者。

^① 尚丁：《〈展望〉周刊始末》，《新闻与传播研究》1982年第6期；王元化：《从“展望”到地下“文萃”》，《新闻记者》1983年第9期。

（二）、创办《天风》杂志

《天风》这本杂志也是由陈仁炳经手参与的一本很重要的杂志，虽然是基督教会办的杂志，但内容以时事政治为主，同样为陈仁炳民主思想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和自由的平台。《天风》文章的基本格调比较平缓，鲜有一些让人醍醐灌顶振聋发聩的锋利文章。在漫长的抗日战争中，民生凋敝，各项事业均处于停滞或倒退状态，国内各大教会的处境也相当困难，《天风》每况愈下，难以维持，但仍未停刊。

1946年的《天风》整体内容以时事政治为主，同时关注国内与国际局势，但论调平缓，很少有振聋发聩之声，相比1945年与1947年都有所逊色。1948年的《天风》基本维持1947年的风格，但自6月吴耀宗辞职后，《天风》比较沉闷，缺失了原有的批判性与战斗性。1949年的《天风》开始有所改观，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至上海解放后，《天风》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人民的刊物了。以吴耀宗为首的一批左倾的基督徒以《天风》为阵地，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时代变革中，针砭时弊，站在基督徒的立场阐发自己的政治主张。从基督教与政治、基督教与民主、基督教与时局等方面进行了阐述。虽然有些主张并不是很明确，具有一定的含糊性，但总体而言，是不断趋于明朗、坚定而有力的。他们在批评时政的同时，也积极反省教会自身的问题，坚持教会必须在政治中支持和促进社会正义与社会平等，并提出了许多改进的意见。他们迫切地追求自由、平等、民主的新时代，并且逐渐相信共产党就是他们的希望所在。因此，他们开始支持共产党作为进步力量所进行的战争，并且热切地盼望新时代的到来，希望能参与其中。

1946年至1949年三年间，中国国内的时局表现为国共之间的内战。经历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民生凋敝，生活困难。然而一年之后战争复始，中国教会的境地也日益困难。对于国共战争，教会内部因为立场不同，产生了分歧，大致分为三类。其一，不少信徒支持国民党政权，认为国民党是执政党，得到了美国的援助支持，并且蒋介石也是个基督徒，所以为很多基督徒所认同。此外，蒋介石政府支持基督教的发展。例如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召开重要会议时，蒋介石常常致函祝贺，深得人心。其二，有些信徒政治上倾向共产党，神学立场比较激进，对政府采取批评指责的态度，认可共产党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积极欢迎新时代的到来。《天风》经常登载他们的文章，是他们重要的言

论阵地。其三，在这两种信徒之间，还有一群中立的人。他们没有任何党派色彩，采取超党派的态度，不涉及党派之争。他们的神学立场也各不相同，包括保守派、自由派等等。在对待政治与宗教的关系上，又分为两派：保守派主张政教分离，不谈政治，不论政局，注重培灵、布道、奋兴等教会福音工作。而较为激进、开放的一派，则关注时局，从信仰角度发表意见，担负社会良知和时代先知的责任。在《天风》杂志中，陈仁炳发表的文章非常多。例如，《教会属于人民：以更坚定的信心迎接一九四九年》（《天风》第153期（1949年））、《人口·资源·社会制度》（《天风》158期（1949年））、《论新社会建设》（《天风》1949年7卷6期）、《基督教思想的宽度》（《天风》121期（1948年））、《免于恐惧之自由》（《天风》121期（1948年））、《启蒙运动在开始——论新知识分子的任务》（《天风》新3期（1949年））、《世纪末期的悲哀》（《天风》第42期（1946年））等。

《天风》杂志自创办以来，虽然主编不断更换，办刊宗旨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基本的主张没有更改。它是开放的、自由的、富有批判精神的，在基督教期刊中独树一帜。虽然发行量一直不大，但影响所及，反响热烈。《天风》能够如此，大部分应归功于吴耀宗。吴耀宗辞去主编职务后，《天风》的风格发生了一些变化，大约有半年的时间表现比较沉闷，对于时代敏感问题少有提及。但从1946年到1949年整体来看，《天风》仍然是一个勇士的形象，不断发出先知的声音，在中国教会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样一个周刊，集聚了一批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他们中间有一些激进分子，借助《天风》这个自由开放的媒体，批评时政，高举平等民主的旗帜，要求基督教参与社会革命，呼唤新时代新社会的到来。这样一批激进的基督徒的出现，除个人因素外，变革的时代是其必不可少的成长环境。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各种思潮迭兴，而最终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得以施展拳脚的，不过是国民党秉承的三民主义与共产党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三十年代日本侵略的加剧，以及国民党政权外交的怯懦与军事上的失利，使很多知识分子感到怀疑、失望，并开始寻求新的救国救民道路。而战后国民党不顾民意擅开战端，政治独裁、经济陷入危机，既不能满足民众寻求平安稳的需要，又压制自由民主的要求，导致民主党派与一大批知识分子开始选择革命救国的道路，倾向共产党。具有基督信仰背景的人士只是其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但是目标取向没有什么差别。这样一批激进基督徒的出现，在中国教会内部开始不过是星星之火，然而借助时局的演变渐有燎原之势，最终

引发了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以至后来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成立。

有史以来宗教和政治的关系，一直都是教会内外所关注的热点问题。这方面的论述也是长篇累牍，不胜枚举。但是这里所讨论的却是一个较为特殊的例子。当中国的基督徒面对国、共两党内战的时候，他们面对的是选择。这种选择最后归结为：是视而不见，是作壁上观，还是参与其中？这三种行为向理论延伸即是：福音是否是革命的？激进基督徒的言语和行为是激进的，然而他们思想的出发点依然是信仰，虽然这种信仰已经偏离了基督教的正统信仰根基。他们一切的主张都建立在“基督教是革命的宗教”这一理论之上。而“革命”在这里的含义是追求自由、平等与进步。在抛弃了和平的幻想后，按照二分法的逻辑，这个社会被分为两种截然对立的力量，被表述为进步与腐朽、黑暗与光明、革命与反动。在当时混乱的中国，他们拨云见日，认定国民党与共产党所进行的斗争就代表了这两种力量。他们与国民党渐行渐远，距共产党越来越近。而对于共产党及共产主义将要给中国基督教会带来的巨大变化，他们显然估计不足，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应对理念与措施。他们将福音理解为建立人间天国，于是认定共产党所要实现的目标与基督教的目标基本一致，从而将基督教的福音政治化。他们的思想从神学上来考察，显然受到政治神学的影响，因此，他们加入了摧毁旧时代、创造新时代的斗争之中，被视为“左派”或者“激进派”。我们暂且撇开1949年以后不谈，单单就1946至1949年间中国的形势来看，他们的选择无疑是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趋势，代表了中国教会中的革新力量。这也是他们基于爱国爱教、谋求教会生存与发展的主动选择。

他们的观念并非一直确定不移。套用他们对于基督教的定位，他们也是一群追寻自由、平等与进步的基督徒。随着时局与形势的变化，他们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需要说明的是吴耀宗等人并没有形成一个集体或组织，只是通过《天风》杂志将他们放在一起进行研究。总体而言，他们的思想比较零散，更多的是针对时政而发，并没有在应对时势中形成系统的神学思想。教会没有神学的基础，就等于失去了自己立身的标准和方向，在现实的政治环境中不迷失自己是不可能的。

因此，当他们在1949年后作为教会领袖领导教会前进的时候，所产生的后果以及对于中国教会的影响，至为严重与深远，这是有待进一步拓展研究的

新课题。^①作为基督教义的深信不疑者，陈仁炳和大多数基督教徒一样有着他们特有的敏锐和睿智，洞悉观察社会的点滴变化，抒发和表达他们对于现实社会的看法，描绘他们对于未来社会的畅想。《天风》是另一个开放和民主的思想尽情生长的大舞台，充满了时代的气息。从《天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基督教徒为代表的宗教群体的政治表达和心声，陈仁炳在这个时期从一个笃定的基督教徒慢慢向一个心向民主的政治研究者蜕变。和《展望》一样，这本杂志为陈仁炳这位民主青年提供了抒发己见的平台。

除了《展望》和《天风》两本杂志以外，陈仁炳在《启示》、《独立评论》、《观察》等其他刊物上，也发表过许多文章。例如在《孙中山精神哪里去了？》（《启示》1949年第4期）、《美国第三党的过去与未来》（《启示》1949年第2期）、《启蒙运动的再开始：论新知识份子的任务》（《启示》1949年第3期）、《为人道主义呼吁：由废止体刑问题说起》（《现实文摘》1948年第2卷第11期）等文章，具体内容在下一节论述其民主思想的各个方面时再详述。

三、发表个人文集——陈仁炳民主思想的成熟

（一）《走向民主社会》

1949年3月，正当解放大军兵临长江之际，陈仁炳在上海出版了题为《走向民主社会》的论文集，书中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对即将来临的新中国充满了真诚的希望。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为民主而奋起，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为民主而呼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为民主而直言，此书的书名就昭示了陈仁炳一生政治思想的轨迹。^②

这本文集一共包含了36篇论文，由陈仁炳亲自选编，是他近年来在各刊物零散发表的各方面的文章的代表作。有的抒发了作者对某些重大事件的感触，有一些则表达了他对于某些政治观念的不同意见，还有的是他对社会文化动态和趋势的分析；除了经济和工业方面没有提到，这些文章几乎涵盖了中国民主化进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困难。他认为，今天的世界和中国，都正在朝一个民主的社会行进，在这个过程中，各国人民的努力都是遵循着几条基本规则的。

^① 王翔：《从〈天风〉看中国激进基督教徒的政治表达》（1946-1949），《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61期，2007年4月30日。

^② 徐有成：《唾面自干：陈仁炳的晚年》，《百年潮》，2003年第8期。

政治方面，虽然旧的社会体制已经摇摇欲坠，在新的民主力量面前呈现出一些即将瓦解崩溃的趋势，民主已经为新的社会奠定了基础。在文化和教育方面，民众不仅认识和看到了一个为旧的社会和政府服务的虚伪的文化和教育，另一方面，在旧的文化教育体制之内，正在孕育出一种蓬勃向上的新的文化和教育体制，像雨后春笋般正在萌发，生长。整个社会制度和传统，都在向一个新的方向生长和蜕变，由旧的走向新的，由腐朽走向新生。这个过程中，旧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新的力量的种种顽固抵抗和制衡。不论是在我们自己国家，还是在美国，在很多选择民主之路的国家中，人民难免会在为新社会奋斗的过程中经历许多挫折与磨难，艰辛与痛苦也是在所难免的，然而，如果我们往远处看，一定会发现，只要撇清目前眼前的有限的矛盾，惶恐和不安的浮云与迷雾，不论中国还是美国，全世界人民的前途将是非常光明的。

从这本文集中的文章中不难看出，作者是怀着极为虔诚和恭敬的心情写下这些珍贵的概括的。通过这本文集，把陈仁炳在过去十几年追逐民主的生涯中各种弥足珍贵的想法集中起来，献给那些远在世界各地为中国的民主与进步不懈奋斗的志士仁人分享和借鉴。作者谦逊的说：“我现在将以最虔诚的和虔敬的心绪，将我短短十几个岁月中所写的一些芜杂的平凡的东西，选集起来共享给在这里和遥远的各地的同为中国的民主而努力的朋友们。这些东西多半是在仓促应付中完成的，疏缺的地方一定不少，最大的困难是我们必须在几乎不能说话的情形之下说话，这一定可以由很多篇文章的迂曲中明了言者心中的甘苦。”^①诚然，如今的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作者的心是赤诚的，正如陈仁炳本人所说“许多字和句子是参和着眼泪写下的”。

从内容上看，这个集子分为民主的政治、民主的文化、民主的社会、民主的教育、民主的社会和民主的革命（方式或途径）六个部分，可以说是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在每一个方面，都能够引起那些民主斗士对于整个世界和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种种问题的讨论和思考。另外，我想陈仁炳的内心，对自己的父亲陈崇桂牧师一直是有一种敬仰与敬畏之情的，因此在文集的前言部分最后一句话中，他写到：“我恭敬的将这个集子献给我的父亲——陈崇桂牧师”。^②所以，这不仅是一本抒发民主思想的政治文集，也是一个儿子献给同样关心民主与自由的父亲的最好的礼物！

^① 陈仁炳：《走向民主社会》，上海：中国建设服务社，1949年3月，第1页。

^② 陈仁炳：《走向民主社会》，第2页。

（二）民主的政治——对外求独立，对内求解放

《走向民主社会》中以“民主的政治”开篇，“民主的政治”也是陈仁炳民主思想中最主要的部分，当然也是《走向民主社会》这本文集中所占篇幅最大的板块。关于民主的政治的主要观点，他在《论政治的变动》，《论政治作风》，《论政治道德》，《政治运动与道德力量》，《论国家民族政府》，《论官僚政治》，《立场 战略——论自由主义》《超越自由主义》，《革命只有一个》这几篇文章中做了非常生动和详尽的阐述。

在《论政治的变动》一文中，他指出，现在的社会每一个人的心都在变化着，浮动万状，社会的整体局势也在急转变化之中，无论是从变化的规模范围还是基本原因而言，这场变动都是中国社会在清朝末年以后所面临的最大的变化。影响和意义都远远超过了1911年和1927年的两场革命，这次变局以政治为基本重心，政治上的错误应起了经济上的乱象，同时也是造成军事上的失利的主要原因。不同的时代社会变动的重心是有所不同的，例如，在马汀路德时代，社会的变动是以宗教的变动为先导的；英国的产业革命时代，社会的变动则突出表现在经济上的革新与进步。但是，对于现在的中国，不论是从目前的形式上来看还是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最为重要的首要问题都是要解决一个根本的政治变动，进而影响军事实力的消长也会自然的改变目前金融的混乱和人民生活的艰辛痛苦的状况，还会对目前混乱的社会状况，浮动变化徘徊不觉的人心起到安定作用。作者对中国政治变动的来龙去脉做了一番分析和观察。^①

政治的变动也是有法可循的，必须循序渐进，不会在一朝一夕之间发生剧烈的变化，根据美国社会学家L.J.Carry氏的分析，一般社会变动的过程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纷扰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危机阶段，最后一个是调整与适应阶段。以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来看，从1927年武汉分裂算起，一直到政治协商会议的破产，一切社会的动荡不安，青年的不满，总的根源都在这一点上，这是了解今天这种纷乱的社会开始。这些就是动乱的第一个阶段。目前阶段，财政金融生产教育文化方面的混乱，就像一种濒临与死亡边缘的病人的垂死挣扎，也就是动乱的第二个阶段，危机阶段，至于即将到来的局面究竟会如何，也就是第三个变动发生后的调整和适应阶段，作者认为“天下没有一个不结束的局面，船到桥头自然直”早已做出了深刻的语言，在心目中已经有了预想和

^① 陈仁炳：《论政治变动》，《走向民主社会》第一章。

猜测，他认为“我们的政治变动恐怕迟早也会由第二个阶段转入第三个阶段的一天”。在这个阶段中有主次矛盾之分，大小矛盾之分，环环相扣，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作者以《雷雨》中的鲁侍萍对四凤说的话作为比方，认为“一步走错，步步都错”。又分别以美国的“选举政治”和“经济措施”分别为例，论证了政治变动的有规可循和与其他变动之间的紧密关系。他指出了在社会变动为及来临之时民宗因有的自处之道是——首先，人民应当趁此机会在大变动中再次人情政治变动的现实，坚持自己享有的政治权利，让许多过去惨痛的代价换来现在民众政治上的觉悟。其次是在变动中应保持镇定，不听信谣言，保持清醒的头脑。最后是要对中国经来建设的问题加以关注，政治的变动不是为了延续旧的腐朽的躯体之上的旧政治，而是为了一个更加踏实的政治生命的诞生而进行的变动，变动时痛苦的，但希望能换来快乐，为了饱受苦难的中国人民。

对于政治作风问题，陈仁炳有自己的独特的观点。他引用耶稣的话认为“凡隐藏的事无不显露出来”。反对伪政治，主张政治作风上的统一性和一贯性，以岗村宁次被宣判无罪为例子，斥责了这种掩盖罪行“华容道”式的判决，阐明了一个政权作风的一方面，认为这些决定都是为政权服务的，一个政权往往遵循以下两条原则，从政治权术的灵活应用来看，他是“以万变应不变的”。“万变”是客观形势，不变是少数人主观的想象和欲求，则只能关键目标和手段是统一的，想法和目标是一贯的。某种政权的本质决定了政治作风的表现，这个表现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就是一切为了政治利益而存在，万变不离其宗。同时，这个政权也具有高度的一贯性，与历史背道而驰的趋向百折不挠。他主张对于脱胎换骨的新的政治力量的兴起，政治运动的发生，应当求之不得，双手赞成，但是对于换汤不换药的老作风之下的新革命极力反对！^①

关于政治道德问题，陈仁炳也有自己的主张。他认为在目前现实的政治舞台面前，没有几个人是值得和他们谈政治道德的，都已经到了穷凶极恶廉耻尽丧的地步，因为世纪末日就快到来了，要尽快的“脸皮厚”、“贪”、“黑”、“骗”、“溜”、“卷”、“捞”，把握住这最后的机会。不过在新世纪到来以前，那些生活在旧世纪的还对过去生活眷恋的人，也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有强烈的预感了。他以《大公报》上登载的张群回到家乡四川时的无限惆怅的感慨，和当时以邦和下西洋精神作为标榜以及当时万人空巷的古装四幕剧《明末遗恨》为例子，说明了大家对这种“覆朝悲剧”、孤臣孽子的推崇，说明当新社会到来时的人心

^① 陈仁炳《论政治作风》，出处同上。

所向。对人政治道德的考验，往往难在失败之时，而不是成功之时，不难在“进”之时，而难在“退”之时。所以这个时期也是对于政治道德最为考验的时期，尤其是在打退堂鼓时表现的政治道德，是更加难能可贵的。崇祯皇帝就是一个典型。在陈仁炳眼里没有政治道德可言的昏庸的皇帝，明明知道朝中奸臣当道，仍姑息纵容，一叶蔽目不见泰山，到明朝走到穷途末路之际，他仍然不检讨自己的错误，甚至认为“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而历史总是有惊人的相似，好像一直在重蹈前人的覆辙一样。清末也有和崇祯一样缺乏诚意，只有私心，不善进也不善退的政治家，“共和”，“立宪”假意昭告退位，始终是一纸空文豪无诚意，正是这种在陈仁炳看来极为没有政治道德。所以，除了当时中国民主主义的抬头，缺乏诚意，始终敷衍、伪装、出尔反尔的政治态度，是造成满清政权分崩离析的一个非常重要原因。这个曾经强极一时的政权，最终败亡在一个“私”字上。谈到政治道德，只要能做到光明、诚实，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以天下大计为己任就行了。近十年世界历史的演变，告诉我们一个教训，那就是旧式的传统的观念需要彻底改头换面了，因为原先认为行不通、不可能实现的，现如今正在一步一步实现！任何政治运动和道德的力量都是息息相关的。世界正在发生着奇妙的变化，世界史上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各个国家在政治演变中均发生了冲破常规的变故。一个是美国的罗斯福总统，怀着一颗为民为社会的赤诚之心，整治经济，为民争取福利，解决就业，度过经济危机等一系列开明政策，打破了美国百年历史，奇迹般的四届总统连任，以及博得全世界民众的爱戴和支持。另一个是作为英国反法西斯元勋的丘吉尔，墨守成规，死守着资产阶级特权这颗旧头脑，不求变通进取，在战后遭到英国国民的冷遇和抛弃，直至暮年仍然在做不受欢迎的政治挣扎。陈仁炳用二人的例子，鲜活的表明政治道德在政治运动中举足轻重的影响和威慑。这种表现在当前时局中政治运动里面的道德力量，其实真正根源就在人民大众本身。人民本身就如同一架发电机，是一切力量的源泉。

在国家、民族、政府三者的关系上，首先，陈仁炳认为在理解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核心思想问题上，存在很多人对民族、民主等词的概念理解是有偏差的。他认为第一，“民族——由于设想的血统关系联系起来的一切人民，通常有着共同的语言，习惯，宗教，以及共同利益的相互联系”。第二，“国家——一个政治集团，有一定的土地范围，在一个有独立主权的政府之下组织成立的。第三，政府即成的政治统治和管理的形式与系统。中华民族是一个有传统的伟

大的有凝聚力的民族，我们在几千年的历史洪流中吸收了许多外来分子的优秀品质，形成了我们独有的思想、文字、语言，并且在本国之内取得了一定的统一，形成了我们多民族下比较统一的文化定势。同样，中国人的国家观念也并不落后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为了爱护这个国家有很多人做出了非常艰难的牺牲。百分之百的中国纯洁青年，都是非常爱国的。亿万民众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这期间每一次运动所表现出来的排山倒海般的气势和震慑力都是相当惊人的！而“政府”并不等于国家，这里作者愿意充当使人见而生畏或生厌的角色来对爱国主义精神，民族自豪主义精神耳提面命痛苦说教的角色，是因为大家将政府和国家的概念混为一谈。政府不等于国家，国家不变，政府可以改变，政府在人民的政治生活中是一个不固定的东西，反对政府不等于反对自己的国家，反对政府不等于不爱自己的民族，援引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中提到的“民权，民主，民生”，陈先生觉得民众应当分清楚三者的定义和关系，并在此申明：“我们对于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是有信念的，我们对于一切善良的人民为国家的努力挣扎是抱乐观的。我们可爱的国家一定有前途，对于这一点，我们没有丝毫犹疑，因为这个国家是我们的”。^①

由对政府和国家的关系进而引发了对官僚政治阿谀奉承之风，对崇媚天子的陋习的驳斥，对政治立场战略的阐释，和对自由主义精神的探讨，他认为，所谓的自由主义者认为必须掌握政权才能发挥作用的观念是个绝对错误的观念“并不一定要掌握政权也能在政治中发挥作用，自由是相对的有限的自由，而不是绝对的以夺权为目的的自由，以为主张和提倡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应当对亮点进行再思考，一是在中国政治局面的背后基本立场是什么？二是大家在为共同的目标——即中国的民主而奋斗的过程中，基本战略又是什么？对此他提出了应当不脱离历史本身从历史本身出发的基本立场和循序渐进有的放矢的步骤“和战”，最后提出了中国人民为民主而奋斗的基本使命是应当超越这种所谓的“自由主义”带来的资本主义精神，不是绝对的自由和放任，是一个建立在平等民主观念之上的相对自由精神。

综上所述，作者提出“革命只有一个”——民主革命，全世界的民主革命也只有一个目标——全人类生活的自由，保障，改善与进步。中国的革命目标也只有一个——对外求独立，对内求解放。最终建立一个政治自由，经济平等

^① 陈仁炳：《国家民族和政府》，《展望》，三卷六期，1947年第3期。

民主进步的新社会。^①

（三）民主的文化——破除封建愚昧，“医治”病态文化

对于民主的文化这一部分，陈仁炳提出了“文化”一词的本质。文化是我们人类社会达成生存目标的一种重要的工具，就形式而言，包含了人类生活中各种形态、各种模式以及生活方式，是由历史所形成的，由同样的人共同守持着。就其创造与继续存在的过程而言，文化又是人类突破生物进化过程中的产品。人类文化的传播，主要是依赖于思想意识的沟通和文物的交换，和一代接一代的传承，所以文化又具有不断积累的特征。^②

在理解文化本质的基础之上，陈仁炳提出了“文化病”这个概念，他认为，对于生命现象来说，常常会因为基本功能发生障碍或者不平衡而演化成顽固的疾病，或者病入膏肓，同样，在社会现象的环境中，也可能因为整个社会的政治发生了内在的失调，腐蚀或者毒化表现为一种病态，这就是“文化病”。文化与政治是密不可分的，作者通过阅读梁漱溟和张东荪两位前辈发表的两篇文章，发现他们中均是由当前社会文化的分析追溯到政治病根所在，并由文化的诊断来推论中国民主过程中的障碍和困难，从而引起对政治与文化相互关系的无限兴趣。得到的结论是，中国的整治改造运动从来没有顾及到文化基础的改造和动摇，所以屡遭失败，如今的问题在于我们的社会文化严重失衡，从这一点出发，展开了对于整个现代文化体系的缺陷，会以怎样的病症，表现在社会各个方面的探讨。

文化是达成生存目标的一种重要工具，离开了文化，我们不能有效的沟通和交流。文化的失调与社会中的很多因素相互作用，文化病的病根就是文化的失调，表现为在政治经济、教育制度等多个方面。“文化失调”一说原本源自美国的奥克朋教授，大意是文化分成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两大部分。文化在变时，往往物质的部分先变，驰骋千里；而非物质文化这个部分、包括思想观念传统等，往往跟不上，发生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后滞；二者发生了严重的脱节。根据美国凯思教授的理论，将人类社会在历史上的进步，分为三大社会过程。这三大过程已经包含了人类社会过去、现今，甚至未来所取得的文化成就，分别为人类对于大自然的开发，人类社会一种渐趋平等的过程，第三个过程就是人类

^① 陈仁炳：《革命只有一个》，《展望》三卷十八期。1946年第二期。

^② 陈仁炳：《论文化病》，《走向民主社会》第二章。

之间的剥削关系逐渐减少，真正的社会平等逐渐建立。^①第三个过程除了生产技术的提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改变以外，人类有对于宇宙人生社会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以及对于各种终极目标追求的诉求。他认为，在谈文化失调这个问题时，一定要依照文化发展的这三个阶段规范的来分析。我们应当分清楚“西方文化”、“工业文明”、“农业文明”、“科学文明”、“现代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诸如类似的定义弄清楚，他们往往有相互交叉的部分。只有把这些名词的定义弄清楚了，才能够谈中西文化的交流、移植、冲突、矛盾与调和，以及失调等一系列问题。分清楚了以后，我们发现，凯思教授将文化分为三个部分的分法，要比奥克朋教授的两分法似乎科学很多。

中国目前的确有着很多的文化失调问题，表现为落后的政治制度，凋敝的经济，失败的一切，但是这个失调的根本原因所在似乎并不是奥克朋教授所说的纯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不同步，脱节的原因，也似乎并不全是什么别的国家的文化制度不合适我们国家的基本国情，或者说是我们自己固有的文化的原因，问题的症结所在是，“如果剥削不停止，如果以统治阶级利益为前提的政治基础不改变，无论什么英美的好东西，一到了中国就会变质。今天的文化失调，失调的就是科学生产与民主精神二者之间的关系，失调的是原子能与管制原子能的诚意二者之间的、可以救了或者毁了整个人类的那点子联系”。^②

陈仁炳认为，病态的文化，文化的失调，一切的病根，并不是由于不肯接受固有的文化以外的文化，所以相互间显示出失调之处；而是社会既得利益的特权不接受民主的引入，不欢迎任何形式的外来或者自发的民主改革。“放眼世界，自爱迪生以致爱因斯坦所积累下来的物质文明，已经达原子能、子弹的高峰，而像罗斯福、威尔斯那样的巨人的天下一家的理想，远跟在后面，气喘喘的争取拥护者；而目前，毁灭、自投火坑者，却滔滔天下皆是，这是太可令人太息的！”根据这一病症的根源，他借用报载的蒋介石夫人的文章《如何拯救文明》为题，提出了如何拯救文明的方法，应该是——给中国人民自由，给中国人民自由，即是拯救了中国；而拯救了中国文明，既是拯救了世界的文明。虽然这个代价是惨重的，但是我们这个国家握有原子弹，要等我们这个国家实现了自由以后，才可以稍微减少这种代价，人类文明呻吟病榻已久，如果现在还不采取行动，什么时候才能得到拯救呢？知识分子作为时代的先觉者，有着艰

^① 陈仁炳：《论文化病——文化失调与坏的一切》，《走向民主社会》第三章。

^② 陈仁炳：《病根还是在不肯要民主》，《走向民主社会》第三章。

巨大的任务。在《启蒙运动的再开始》一文中，陈仁炳论述了知识分子应有的态度和艰巨的任务，他们的声音会传达给普通的民众，我们需要知识分子再掀起一场启蒙运动。自五四运动之后的启蒙运动是失败的，九一八和一二八运动，给了我们再次开始促进中国人民政治文化觉醒的机会。中国的知识青年并不应该错过这样黄金的机会，他们醒了，开始呼号奔走，开始流血牺牲，在重重的阻挠中，这种启蒙工作从未停止过，相反地，在广大的中国它不断的壮大，壮大，发扬胜利。中国的新启蒙运动只是受了一些挫折，却从没有停止过。今天我们又可以大刀阔斧的再度开始做破除愚昧和迷信的启蒙运动了，这就是新知识分子的任务！^①

我们的文化是多元化的，摒弃消沉的、落后的、封闭的文化！我们需要聆听歌声、呐喊，我们需要优秀的文学作品，今天全国人民的喉舌不能再封锁了，青年们的歌声不能再抑制住了。人民要求说话，要求更多的光和更多的热，更多的人间味，更多的自由。人们要求开口，要求放开嗓子，欢呼、诉说、歌唱，青年学者、文化工作者、诗人、学者、演员、歌手、出版者、科学家、政治经济学者，现在应该是大家发动一个更新一些的、更伟大的中国启蒙运动的时候了！“这是新知识分子报效祖国的途径。任何一个社会，在彻底改造以前先需要彻底的觉醒，强有力的民主运动一定要奠基于启蒙工作，这是时代对于新知识分子的挑战。”^②

（四）民主的教育——拯救扶持国民教育，保护重视知识分子

作为最早一批在沪江大学度过大学时代、又到美国留学深造的陈仁炳来说，民主开化的教育，无疑是让他觉得既受益终身又引以为豪的经历。所以对于教育这个推动社会进步的有力的秘密武器，他有自己的一些独特的见解。

收录在这本书中的《论政治缝隙里的教育》、《论学潮》、《关于解聘教授制度与开除学生》、《论知识分子的愚昧》这几篇文章中，他深入浅出的阐明了关于教育的几点看法。他认为，正如军事是政治的延伸一样，教育也是政治的延伸，只不过这两者是一个文一个武罢了，他对现实的教育状况极为不满，认为当前的教育是在“政治缝隙中的一种可怜的生存，在最困窘的方式下苟延残喘”。

^① 陈仁炳：《论再造启蒙运动》，《启示》1947年第3期。

^② 陈仁炳：《启蒙运动的再开始——论新知识分子的任务》，《启示》1947年新3期。

①现实的教育圈里充满了阴霾、沉闷、污浊、阴毒，政治的压力由四面八方向我们原本就已经弱不禁风的教育体制袭来，使得新生教育的幼芽窒息到无法生长下去，教育经费的严重缺乏，对于教育来说，就像一颗亟待生长发育的小幼苗没有保障基本生长的营养一样，只有先天发育不良，后天生长不足了！

官场上面淘汰下来的残兵败将挤来干教育投机；五花八门的、各种短期性的、草率了事的、另有作用的训练班，也打上了教育的旗号。无论时局怎样窘迫，教育这个点缀是不能让她停止的，教育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教育应当是民主的、合理的，通过学习整理收集资料言传身教，通过对于人与人关系的认知，养成独立生活的习惯，养成尊重社会利益、顾全大局的习惯，而不是为政治服务的，不是让政治统治的目的代替了教育本身的目的。这种夹杂在政治缝隙里生存下来的教育体制是将永远桎梏而得不到解放的！^② 政治和教育唇齿相依，当一种政治鼓励并推崇一种教育方式的时候，它将会延续存在一个时期，等到和母体同归于尽之时，任何一个走向民主教育和科学教育的努力都会遭到难以想象的阻力在政治的缝隙里生存的教育前途并不乐观，政治不变，教育的苦痛就仍然会一步一步往下拖延！将中国的教育救拔出这种水深火热的法西斯般的污染环境，走上民主的途径是当务之急！

对于和教育直接相关的学生问题，“学潮”即学生运动问题，作者提出了几点值得思考的方面，他认为当局在认识学潮问题上一直是采取了一个因果倒置的错误观念，认为有史以来学生运动是造成社会不安定，国家纷乱的原因，在立场上一直和学生保持防范，戒备的心里，距离也越来越远！进而造成了学生始终不信任政府，始终在心理上的反叛和敌视政府，他呼吁我们的当局应当竭力为我们的国家保持几分元气，了解学生，体谅学生，爱惜学生，放弃过去对于一般学生活动的错误的因果倒置的看法，学生运动的背后的基本原因大致都是学生们对于现状的不满和政府的抗议，当局从自身出发，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③

对于当时出现的从北京到台湾，到广州，再到昆明等地相继出现的多例不同规模的公开或变相的解聘和开除学生事件的发生，这些被解聘和被开除的教授和学生都是最纯洁善良的文化工作者和最无抵抗力量的青年！他持严厉反对的态度，有些教授因为平时表现出了一些对当局不满，表现出了一些比常人多

^① 陈仁炳：《论政治缝隙里的教育》，《展望》1947年第20卷17期。

^② 陈仁炳：《论政治缝隙里的教育》，出处同上。

^③ 陈仁炳：《论学潮》，《展望》1946年第二卷一期。

一点儿的正义感以及一些学生比较开眼看世界的学生，都以杀鸡儆猴之势被合理“肃清”了！这种做法，一方面侵害了老师和教授的学术思想自由和职业自由。另一方面也剥夺了许多青年学生受教育和自由发展的权利！无论以哪种方式出现的解聘和开除学生现象，不但表明了教育和学术独立自由的破产，而且充分的暴露了一部分人肩负教育神圣职责的人的卑劣和怯懦！这是社会上一切爱好正义主张公道的人们应该一起来反抗的！^①

在民主的政治章节中，作者谈到了当前的社会需要知识分子来继续推动一场新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具有艰巨的历史使命。但陈仁炳对知识分子也有很多疑虑。他说：知识不等于智慧，而对于政治现实的判断往往需要智慧，所以有了知识并不等于有了智慧。因此，一些学问极好的人往往做出极端愚蠢的事，说出一些背离历史的话，甚至陷入了时代的悲剧之中而不自觉。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于政治现实及其是非的了解及判断令人不敢恭维。^②中国社会的典型知识分子，其出身和教育经历给了他们太多的限制。今天的知识分子，既是昨天教育的产物，然而我们近数十年政府办的那种教育，给知识分子身上打下了太多深深的阶级烙印，具有很强的局限性。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仍然流连于过去的优越地位和特殊权利，憧憬着往日养尊处优的生活。这一部分人游离来去的结果，就是很可能继续粘附在特权阶级的统治阶层，而不会做出真正的有实质意义的变革。这是我们需要思考和看到的知识分子的愚昧所在！^③

（五）民主的社会——配置社会人口资源，解放妇女儿童自由

怎样的社会可以称之为一个民主的社会？人口资源匹配适度，供应充足，合理分配，人道主义精神日益强化，人的权利和利益得到保障，妇女和儿童得到解放，这是一个健康的民主的社会应有的基本状态。

在《人口·资源·社会制度》一文中，陈仁炳提出维系社会的基本要素——资源问题，以及人口与资源、社会制度之间的相互制衡关系。他对人口问题出发，提出了一个引人思考的问题：人口和资源，例如我们的粮食，它们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是不是人口多了就一定不够饭吃；人口少了，就一定能保

^① 陈仁炳：《关于解聘教授与开除学生、读报偶笔》，《展望》1948年第2卷第12期，第2页。

^② 陈仁炳：《论知识份子的天真》，《展望》1948年第2卷第5期，第4页。

^③ 陈仁炳：《论知识分子的愚昧》，《展望》1948年第2卷第5期，第9页。

证人人吃饱？^①英国著名的人口学家马尔萨斯曾提出过这样的理论。他认为，人口和食物犹如一架天平，人口多了食物自然少了，反之亦然。他认为，人类的悲剧主要就是由于人类本身的几乎不可遏止的膨胀造成的，它是事物的增长永远不可企及的。除非是赶上天灾人祸的组织或者是由于人类自身道德的遏制，人口的增加永远要跑到粮食的增加前面去。他并不信任人类的理性，因此得到了三个结论。第一，人口发展最后一定会受到食料的制约；第二，食料增加了，人口一定会增加，除非受到限制；第三，所谓的限制分为两种，天灾人祸等积极的限制和晚婚节育之人类的预防的限制。他认为贫穷阶级越贫穷越多生子女，一切救济贫困的办法就是多生子女，一切社会主义时代提高人的地位的方法，就是看你生育子女的能力的高低。对此，陈仁炳认为马尔萨斯的看法偏重消极了，觉得略有些反动意识的马尔萨斯，不过只是想用他的人口学说来抵制法国大革命以后在英国盛行一时的改革社会主义思潮的工具。他的观念最大的错误，就在于将社会幸福或者痛苦的问题，看作单纯的吃饱肚子即粮食供应问题。这是马尔萨斯学说的致命伤。人口与社会资源的问题必须要以多元的眼光来研究，包含了人口的数量，现存的资源，生产的技术和方法三个方面。而不是单纯的数量上的对比。马尔萨斯未考虑到这个层面，就是生产的技术的提高也会成为平衡人口和资源的一个重要的筹码。^②

而这个生产能力是通过什么表现出来的呢？是经济基础，是建立在一定分配制度之上的经济基础决定的，研究人口必须要将其摆放在基本的制度之上，基本的制度决定了收入分配的原则，收入分配的原则决定了很多人的行为表现。制度就像两个筛子，将全社会的劳力、才智、技术、血汗，加上资源的出产科学技术技巧等一股脑儿地放在一起，另一部分的财富已经“溜”到了特权阶级手中。何为制度？制度就是这种吸汗不见形，杀人不见血的东西！虽然打着“人口过剩”“生命线”这样的幌子，但最终不过是演化成人对人的剥削，一个阶级对一个阶级的剥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之间的倾轧，演化成战争、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对这种搜刮百姓为目标的特权阶级深恶痛绝！“人类社会的悲剧，社会的痛苦，不少一部分是由于制度造成的，解铃还需系列系令人”^③所以改变必须要从改变制度本身做起。马尔萨斯之所以反对他的父亲，反对戈德文，反对社会主义，就是因为，他只是之中都不相信改革

^① 陈仁炳：《人口、资源、社会制度》，《现实文摘》1948年第2卷第11期，第9-11页。

^② 陈仁炳：《人口资源社会》，《天风》1948年七卷六期。

^③ 陈仁炳：《为人道主义呼吁：由废止体刑问题说起》，《现实文摘》1948年第2卷第11期，第6-7页。

社会制度可以改变人类悲剧的命运。和马尔萨斯一样的人还有很多，但是，这并不妨碍新民主主义作为前导的社会主义在世界各地一天一天的接近成功。过去的腐朽的不平等的制度一定会被铲除掉，新的合理的制度一定会被建立起来！

人道主义精神的提倡也应该是一个民主的社会的基本标志，对于人类身体的惩罚的体罚体刑必须要废除，这才是一个社会走向民主的社会的开端，人不但不是万物之灵，也是万物中最残酷者，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每一条道路上都充满了崎岖，坎坷和血腥，人吃人，人剥削人，人虐待人的事实充斥着整条荆棘的道路。渐渐的，人类开始从感性，黑暗，残酷，进入到理性，光明，互爱 and 反残酷。这就是人道主义的道路，人道主义就是把人当成人来看，而不是动物，牲口是奴隶，人道主义的核心思想和最重要的中心意义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它是现代民主思潮中的重要基石！也是用来检验一个社会主义民主与否的尺度之一。

人类血淋淋的历史，历史中，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洋史，从古埃及人用的刑讯，以及美国那时仍然在使用的第三极审讯法，以及英国在刑罚某重犯时用的九尾鞭。社会中还大量普遍存在的各种缺乏对生命的尊重的，滥用私刑，采取刑讯逼供等非人道的残酷的做法必须马上取消！作为一个现代国家，我们必须彻底的废除一切公私体刑，一刻也不能再拖延下去！我们的同胞们经历的痛苦太多了！许多冤狱就是由此产生的！许多悲剧也是由此酿成的！无数的年轻人因此丧失了他们自主的意识，许多民众的基本权利也受到了剥损的关键就是这种完全没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体刑大量普遍的存在。这个问题不解决一切都属空谈！

关于社会中的两大弱势群体妇女和儿童的权益的实现与否，也是检测一个民主的开放的社会合格与否的试金石，在《解放妇女》和《解放儿童》两篇文章中，陈仁炳提出要解放妇女就要先解放人，就是前面探讨的关于取消一切对人权对人的生命不尊重践踏的体刑行为的取消势在必行！要解出妇女身上的桎梏首先应该解放人民身上的枷锁！这种剥削人管制人的制度存在一天，妇女的自由就无望实现一天！压在中国妇女身上的重压和负担实在是太沉重了！不仅有封建社会给予她们的重压，还有内战给他们带来的新的痛苦和压力！他们和同样弱势的儿童成了那些强有力的残暴的征服者首当其冲凌辱的对象！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了两性的分工，封建和宗法传统里的财产制度，婚姻制度，伦理观念，道德标准，却没有一样是建立在两性平等基础之上的。随着工业革

命的到来，本应该是为妇女的解放提供了大好的机会的，但是，相反，为了资本主义的繁荣发展，妇女们被迫参加到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中，用他们的十指去辛勤的和男人一样的劳动。她们是在为了全民族全人类的进步而生活，为了革命和科学而献身，他们推动了人类一步一步更加接近合理和光明，更加接近进步也更加接近全人类妇女的彻底解放。妇女权益的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不是单纯的问题，解决起来又会引发一系列别的连带的问题，例如某上海禁舞的问题所暴露出来的严重的生计问题等，“家庭妇女的生活改进和权益保障，教育问题，职业机会以及待遇问题，法律的问题，劳动妇女受剥削的问题等等，提起来似乎是千头万绪，整个的社会问题要整个的解决，基本解决的方案只有一个——民主！”^①

儿童是人类生命的延续是人类朝气和活力的象征，是未来的希望，国外的儿童节在春天寓意万物复苏的希望和生长的到来，在我们的国家确实一片萧条的景象，看不到希望，看不到生机，就像万物萧条的秋季。^②在时代的苦难中，儿童是最先被摧毁的牺牲者，在内战烽火所造成的惨重的社会中，儿童的所遭受的一切是最令人痛心的！因为斩断他们的发育就是砍掉民族的生机。因为内战造成的通货膨胀令孩子们食不果腹，在大量的工厂里，我们看到孩子们和成人一样从事着超体力的强化劳动，迫于生活的无奈，有一些本该在父母身边，在学校享受童年应有的关怀和教育的孩子们参与非法组织以行窃或是乞讨为生，沦为了“黄牛党”做起了贩卖高价车票或戏票的黑市买卖，或是沦为“小蚂蟥”替妓女拉客，冒着生命的危险区的大车后面偷棉花，一不小心就沦为了大汽车车轮下的孤魂野鬼！可怕的是在苦难的生活中极少有一部分人会更加认清人的使命，努力创造自己的新环境，建立自己的理想的江山，绝大部分孩子在这种长期挣扎着在死亡线上的社会中部被当作人看待，自然也就无心去作一个有着健全思想和人格的人，这是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③

（六）民主的革命——主张和平民主建国，反对暴力流血战争

在“民主的革命”这一章节主要由《合流与逆流》，《泛论和战》，《再论和战》，《法统论》，《战犯论》这几篇文章构成。作者欣慰的感到中国的民主的革

^① 陈仁炳：《解放妇女》，《展望》1947年三卷十六期。

^② 陈仁炳：《解放儿童——春天里的秋天》，《天风》1946年五卷十三期。

^③ 陈仁炳：《解放儿童——天堂里的地域》出处同上。

命正在进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政治觉悟的不同，追求理想的迥异，将人分为了两个不同的流派，有的人经过了长达十一年的抗日战争的浩劫，坚强的中华儿女从八年的艰苦卓绝的战争洗礼中慢慢想从幼稚走向成熟，思想动摇的倒下去了，果断行事的人们站了起来，而有的人魑魅魍魉如汪精卫一样的人，也现出了他们的原型，有的人则是在国家民族，同胞兄弟姐妹们流血牺牲之时趁机做了一把收益不菲的政治投机。对于这些人来说，八年的血泪抗战史不过是给他们劫收财富的成果做了点缀，抗战胜利后的三个年头，本该是垂死挣扎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的中国百姓来迎接胜利，欢呼雀跃的时候。可是，因为有了这些人的存在，他们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不是兴奋不是希望，不是梦想，是煎熬，是失望，是新一轮的水深火热！^①这就是民主革命进行时中的所谓顺流和逆流。

抗战胜利以后，爱好和平和团结的人将最大的希望都寄托在政治系上会议上面，几乎所有的老百姓，知识分子，一切无私的人们都把在那个时候，都以为从此以后真的可以希望“政治问题已政治方式解决”了，而不再是以血腥的暴力的战争，打压等手段。全国人民也可以喘一口气，好好休养一下八年抗日战争给他们带来的创伤，继而吧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的新社会。然而，正是因为这样一股逆流的袭来，使得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优势一片凄凉和痛苦！是散发着腐臭的腐朽和落后，是一种足以把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再次吞噬掉的新的民族危机，是一种类似于日本法西斯卷土重来的威慑，短短的三年，黎民百姓有的竟是深深的失望和绝望，绝不是战争胜利后的那种如释重负般的舒畅感。一场民主的革命亟待展开，一刻也不能推迟！人民已经认清了这股逆流势力的本质，得到了三个发人深省的教训，一是，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都是可爱的，我们的民族的独立存在是可以实现的，所以每一个人都应当尽全力去保护他，争取实现独立和自由。第二，团结就是力量，为了国家和我们的幸福生活，我们必须团结，我们必须保护一切善良的，处于人民并保卫人民的力量团结。第三，抗战是一块试金石，所有站在特权的，自私的立场上的分子经过抗战的烈火，都显示出了出了原形。^②

通过这些深刻的教训经验总结，人们开始慢慢认清这股逆流的本质渐渐的也形成了和这股逆流对抗的合流，从政治认识连看，比起十年前，现在无论是学生，知识分子还普通大众百姓，大家对政治常识的认识，政治事件的判断政

^① 陈仁炳：《中国民主革命在进行中——论合流与逆流》，《展望》1946年二卷七七增刊。

^② 陈仁炳：《中国民主革命在进行中——泛论和战》，《展望》1946第二卷七七增刊。

治形势的分析等各个方面都要健全的多，成熟得多。其次，从生活实践方面来说，也远比过去有了很大的进步，八年的抗战给了情难学生们丰富的生活实践经验和教训，在下乡务农，粗茶淡饭，与农民兄弟共同生活的过程中品尝到了更多的生活的酸甜苦辣。体会到了集体生活劳动的力量。这样，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工人，各行职业从业员等等，他们汇合了力量，凝结了意志。过去的政协原本就象征着一股合流，客观上的逆流把它摧毁了，但是一个新的政治上的河流又在犹如涓涓细流，潺潺小溪般慢慢汇聚在一起，它将汇聚成奔腾的江河，总之，抗日战争给予我们的经验是相当丰富的，最大的莫过于人民开始知道珍惜自身的民运和幸福！

作者认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并且从中学到了很多经验和教训，对外实现了民族独立，所以对内，我们要展开新一轮的民主之战，实现和平民主的建国目标。对追求和平的战役称之为“和战”通过《泛论和战》和《再论和战》两篇文章做了详尽的论述，他认为，是“合”还是“战”这两件事情两张主张和态度都是客观的产物，即使战意盎然，战争的意志跃然纸上，是否就意味着要抗战到底？而关于“和”的谈论沸腾大街小巷，关于“和”的谣言众说纷纭，又是否能真的信以为真，而不怀疑只是一纸空文或是虚张声势。结果还并不明确，就像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亟待知道却又不得不等待最后的答案的事情还有很多，眼前的组多重要的问题的答案很多人是胸中有数的。所以在此只能泛泛而谈了。^①

接着，陈仁炳以《法统论》和《战犯论》两篇文章，分别论述了对于“法统”的理解和“战犯”的看法。“法统”二字一直是近来“和战问题”双方文告中最瞩目的条件之一，不仅是一个争议的中心，也是目前大家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问题。陈仁炳用历史和现代的眼光对其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何谓法统？”“在过去的历史里，败者为寇，胜者为王，既成事实就是法统。在人民的眼里，凡由人民所创造的，就是法统，人民本身就是法统，除人民以外无法统。”^②

在《战犯论》一文中，他提出了“战犯”、“罪犯”观念的由来和演进。从广泛的世界史实讨论了二者的概念起源和演进。进而引发了一个更加微妙的讨论就是：在中国的内战里，发动战争、继续战争，以及支持战争，责任究竟在谁那里？是不是国民党所说的“这是由于共产党的再次叛乱，先起其端”，以及

^① 陈仁炳：《中国革命正在进行时——再论和战》，《展望》1947年三卷十二期。

^② 陈仁炳：《法统论》1947年中建综合版一卷一期。

如蒋介石总统在元旦文告中所说的“共产党对于一切协议和方案都横加阻挡”。或是如毛泽东在1月14日的声明中所说的“南京国民党某某政府，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违背人民的意志，撕毁停战协议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革命战争”，^①双方各执一词，从客观上那说，人民究竟应当做出怎样的决议和判断呢？陈仁炳认为民众应当怀有严谨认真的态度，对此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并且把自己读西洋侦探小说的经验分享给大家：将所有相关案件，按照时间顺序做一个列表，这样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和启示。他即将手头有限的两三年来关于国共关系破裂、内战爆发的重要事件等，一一收集起来，按先后顺序呈现给大家。陈仁炳采用了很多梁漱溟的资料，希望对专门研究政治的、或者是对这一段政治有兴趣的朋友提供有帮助的参考。

^① 陈仁炳：《战犯论——“战罪”“和”战犯”观念的由来和演进》，《大公报》1947年1月26日。

第三章 反右斗争的打击——陈仁炳民主思想的争议

如果没有发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这场反右派运动，陈仁炳的一生可能光辉与灿烂，而谈不上传奇。就像出生在十九世纪的法国人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1805—1859）一样，后人把他比作是一座“思想的金矿”^①。因为不论是民主主义的忠实信奉者，抑或是对现实的民主主义的批驳反抗者，都很容易从他的言辞著作中，发掘出他们想要的思想资料。陈仁炳和托克维尔一样，是一座思想的矿山，蕴藏着巨大的能量，激发出无限的可能。这个最大的可能，就是可能让中国的民主之路由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蔓延成一条闪烁的金光大道。正是这种信仰和承诺开启了真民主与假民主的争锋相对的狭路。“狭路相逢勇者胜”是一种态度还是一种宿命里的结局？我们很难回答。但是，在整风运动转化为反右运动的时刻，在这条探索中国民主进步的“狭路”上，大众眼里的“勇者”败了，败在了风口浪尖上，败在了开始，也断送了后来一段漫长的岁月。

陈仁炳对于整风运动的思想路线、各党派的关系等，有着与众不同的独特看法。1949年3月，解放军渡江前夕，陈仁炳将自己的文章30余篇集结出版《走向民主社会》一书，批评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

解放后，身为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委员的陈仁炳，1956至1957年在政协的一些会议上，直接和当时一位身兼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等要职的负责人发生冲突，而且不少是政策性问题上的意见分歧。陈仁炳提出：共产党不能一个党说了算，民主党派应该有更大的发言权。他看不惯一些民主人士唯唯诺诺的举动，提出“反对乡原态度，提倡贾谊精神”。他告诉一位同事说，他晚上失眠，打开收音机，想听点音乐催眠，但是从收音机中听到的全部是宣传性的文章和政治歌曲，“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音乐”，“这怎么行”。他认为党的文艺政策要改一改才好。1957年3月19日，在北京召开的政协会议上，陈仁炳坦率提出了意见：“在一座铁桥的落成典礼中，一位高级官员道：‘这座桥是人的努力做成，而不是所谓神的工作’。他随即又说：‘你们基督徒，快把你们的神丢到粪堆里去吧！’这样亵渎神，在我们基督徒心中比侮辱我

^① 汪英：《论一个知识分子与一个时代——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的社会学方法论》，《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24期。

们的母亲更可怕，这不是批评，而是侮辱宗教。”^①

陈在其他的公开场合也有类似的言论。当时的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柯庆施对这些情况自然是一清二楚的。1957年5、6月间，在一次会议上，陈仁炳再次向柯庆施提出：共产党不能一个党说了算，民主党派应该有更大的发言权。引起柯庆施的震怒。柯庆施说：我们共产党是要饭出身的，手中拿着一根打狗棍，如果遇到主人比较客气就算了，但是如果遇到主人不客气，那么我们要用打狗棒打的。陈仁炳闻听此言，一下子默不做声地坐了下来，不久即起身扬长而去。

后来柯庆施还说：几个月前我见到陈仁炳，我告诉他不要看你跳得多么高，我会叫你知道，到底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随后陈仁炳自然而然地就被定性为右派，其中“乡原”一说^②，被定性为攻击民主人士和党外积极分子。当时北京有关方面非常注意陈仁炳和罗隆基之间的“组织关系”。就在陈仁炳被划为右派后，陈仁炳和罗隆基的联系，以及陈仁炳和美国教会的联系，都受到上海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③

当时，没有人能够想，在陈仁炳走完意气风发的八年后，反右派运动风起，民盟成为反右派斗争的重灾户。而在民盟右派的名单上，除了他之外，竟还有他父亲、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陈崇桂的名字。这么高层次上的父子右派，在反右派运动中也许是罕见的现象！

陈仁炳被打成“大右派”，遭到无情的控诉与批判。他晚年在重庆孤独忧郁地度过了余生。1979年摘帽改正运动中，他被摘去了右派的帽子，1980年，绝大多数右派分子获得平反，而他是5名中央级未获平反的右派之一，也是5人当中仅有的一个活着看到自己没有平反的人。1990年12月9日，陈仁炳在上海去世，享年81岁。

历史就是一部高潮跌宕不看到最后永远猜不出结局有的时候即使到了最后也无疾而终周而复始的话剧，没有等到最后那一刻，我们永远猜不透将会发生什么。陈仁炳的一生也像一部历史剧，说前半生辉煌是毫无疑问的，牧师家庭出身，沪江名校求学，海外留学深造，到创办《展望》、《天风》，再到民盟的中央委员，在同龄的青年中，他是进步的、优秀的、拔尖的！后半生若是用凄凉来形容，有些显得过于悲情了，但是这里的凄凉并不是说生活的心酸和不易，

^① 《陈仁炳遗体告别仪式举行》，《文汇报》1990年12月23日，第2版。

^② 乡原，即乡愿，指不讲真话、唯唯诺诺、吹牛拍马的态度，意即虚伪。

^③ 以上引文均参见徐有成《唾面自干：陈仁炳的晚年》，《百年潮》2003年第8期。

从下放到颍桥的农村到一直在复旦大学教书育人度过了晚年的岁月，我想，这里说的凄凉，更多的，还是一种心灵上的孤寂，一种内心上的距离感，一种理想和抱负无法实现的愁肠，一种高山流水难觅知音的忧郁和隐忍的心绪罢！当然，身体上的病痛折磨和早年辛酸的下放的经历已然也是另一种显而易见的凄凉。

一、质疑整风运动——陈仁炳民主思想受质疑

1957年的正常整风运动开展之时，陈仁炳刚刚走过人生中的知天命之年——52岁。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指出，为了适应我们的国家已经从革命的时期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形势，为了克服近几年来党内新滋长的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以及特权思想，必须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和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4月30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毛泽东说：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现在已经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整风运动总的题目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他希望通过各界人士的批评，使党的作风真正得到改进，而且也设想通过党的若干具体领导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来妥善解决实际工作中党与民主党派、党与知识分子的矛盾。

5月1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的整风指示。随即，中央还做出并发表《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人民内部矛盾已经在我国历史舞台上代替敌我矛盾而居于主要地位”。“要在全国采取扩大民主生活、扩大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使领导者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变得容易发现和容易顺利解决，使全体人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感觉到有充分的自由、平等和主人翁的感觉，这样，他们就会更容易地脱离旧时代的影响，更积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这次整风运动的目的，也就是要全党学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以便完满地完成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建成社会主义国家

的伟大任务。”^①此后，全党整风运动即逐步展开。

5月8日—6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了13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5月15日至6月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了25次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各级党政机关和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文化艺术单位的党组织也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欢迎大家“鸣”“放”。广大群众和爱国人士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向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与此同时，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5月14日—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导当前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要求各地的报纸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导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16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指出：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的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一共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大有利益。《指示》强调指出：“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指示》要求暂时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暴露其反动面目，而各级党组织要“好好掌握形势，设法团结多数中间力量，逐步孤立右派，争取胜利”。

5月中旬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他指出“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毛泽东认为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约占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十，党内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新党员，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指示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

^①《为什么要整风？》《人民日报》社论，1957年5月2日。

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指出有人向拥护共产党的人写恐吓信，这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①。此后，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对右派分子进行反击和斗争，事实上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只有坚决地反对一切脱离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在人民中间进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才能顺利地推进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否则就会在人民中间造成思想上政治上的混乱。然而，由于党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导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不幸的后果。

将陈仁炳推上风口浪尖的是《陈仁炳对共产党整风方法的不同意见》^②这篇文章，对于中央大张旗鼓期望值非常高的整风运动，陈仁炳基本上是持完全反对的态度，各个方面都不认同！翻开上海出版的一九五八年六月九日的《解放日报》，只见上面赫然刊登出陈仁炳的文章《陈仁炳对共产党整风方法有不同意见》。^③《解放日报》在发表这篇文章时说明：“这是陈仁炳同志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的书面发言，标题是本报编辑部代加的。”陈仁炳在文章中指出，“作为民主党派的成员，我以最大的忠诚拥护党的整风运动。党这样地以最大的热诚和虚心，征求各方面的批评意见。这样的严格对待自己的精神，是伟大的。”陈仁炳在发言中，说了一个汉代贾谊在“文景之治”时指出王朝危机的故事，当时贾谊在《陈政事疏》中，列政事“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陈仁炳说：“我不敢说一定有叫人痛哭流涕的事情，但是至少，令我们长太息的事情恐怕实在太多了。”陈仁炳对群众不敢鸣放的原因做出了六点分析：“一怕打击报复；二怕党和政府没有决心纠正错误，改正缺点，反而因为提意见而开罪于人；三怕所批评的对象是不倒翁，是一块搬不动的石头，批评由你批评，而不发生纠正错误的效力；四怕所提意见不全面，反被领导拿‘两点论’来加以驳斥；五既然提的是缺点，怕被领导上认为就是否定成绩；六怕领导批评你是在算旧账。”

陈仁炳发言最为关键一点，就是他提出可以“算旧账”：“只要我们的动机

^① 《血液里渗透着资产阶级思想毒计——陈仁炳猖狂反党蓄谋已久》《文汇报》，1957年9月1号第3版。

^② 《陈仁炳对共产党整风方法的不同意见》《解放日报》，1958年6月9日。

^③ 《陈仁炳对共产党整风方法有不同意见(民盟成员在市委宣传会议上的发言)》，《解放日报》，1957年6月9号第2版。

正确，为了党和祖国的前途，而不是为了算账而算账，不算是一种‘算账主义’，那为什么不好算呢？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譬如说，算一算浪费和走弯路的账（如果有这样的账的话），我认为没有坏处，只有好处。”正如40年后上海史的研究者针对这一发言特别指出的：陈仁炳留学美国，深受英美民主政治的影响，他的发言确实如标题所说的，和一般教授从具体问题“就事论事”谈论整风不同，具有政治学观点。而研究者又指出，陈仁炳的发言稿是上海党报《解放日报》在准备反击“右派”言论前两次不加批评和表态的“争鸣”文章之一，这些文章引起毛泽东的高度关注。在1957年6月17日的《文汇报》第三版上刊登的《陈仁炳的算盘》一文中写到“陈仁炳在上影厂开了座谈会但是不肯把记录上交给上影党委，是因为陈仁炳并不认为自己手里拿的是什么座谈会记录，而是一本旧账，——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用来准备随时和共产党算账的！他的这本帐我们已经看到了，但是，他的肚子里究竟还有一把怎么样的不为人知的算盘，却没有知道，我们要求他把那把隐藏在深处的算盘拿出来。！

①

关于“整风运动”态度，应该“虚心拆墙”，这一点又被指为是“一支毒箭”。在1957年6月24号的文汇报上刊登了旭东撰写的《鸣放于整风——评陈仁炳的错误观点》，在整风运动观点的分歧上，对陈仁炳的不同意见给了比较全面的评论^②。首先，关于“整风运动”方法，陈仁炳提出了自己应该“算账主义”，这一点引起了“轩然大波”，以至于“算账主义”一词当时成了一个打上标记的用于，仿佛就是意味着一种极为卑劣和下作的为人处世之风。对于整风运动的方法，要采取“和风细雨”式的润物无声发，还是采取“大鸣大放”速战速决的方法？——陈仁炳持有和大流截然不同的一己之见，他的观点被形象的比喻为“一支毒箭”。^③

关于“整风运动”路线，应该“自下而上”，反对“自上而下”他反对从高层开始抓起，从领导干部开始逐个解决。他觉得应该从下至上掀起一场自下而上的全民整风运动，不是和风细雨般的缓慢进行而是大张旗鼓的大鸣大放的进行。关于“整风运动”方式，应该“召开大会”，反对“个别谈心”^④（《本市文

^① 《陈仁炳的算盘》，《文汇报》，1957年6月17日第3版。

^② 旭东《鸣放于整风——评陈仁炳的错误观点》，《文汇报》1957年6月24日第二版。

^③ 《陈仁炳的一支毒箭——虚心些，再虚心些——论怎样来“拆墙”》，《文汇报》1957年7月11号第2版。

^④ 《本市文艺界揭发右派分子滕白也是陈仁炳的帮凶胡森年连续“放火”煽动闹事破坏团结》，《解放日报》1957年7月14号第1版。

艺界揭发右派分子腾白也是陈仁炳的帮凶胡森年连续“放火”煽动闹事破坏团结》)(《解放日报》1957年7月14号第1版),关于“整风运动”惩处,应该“严厉教育”,反对“组织宽容”《上海右派集团总管孙斯鸣妄想建立反党基地和陈仁炳彭文应结成核心组织培植实力搞乱司法工作借口徐汇区事件向党进攻》)(《文汇报》1957年7月14号第2版,^①)

总结一下,关于整个整风运动,陈仁炳的主要问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首先是陈仁炳在一开始就以悲天悯人的口气提出了煽动性的语言,例如什么“令人痛心的党群关系”。他用“贾谊的治安策”做比喻把各种听到的问题都排队到以后,感到“心头非常沉重和难过”,因为在他看来“令人痛苦流涕”和令人“常太息”的事情太多了!普遍的认为陈仁炳把事态描述的过为严重,扰乱了民心,使得大家消极情绪散布对党对国家失去了信心。第二,谈到对“鸣放”的看法时,他便显出莫名其妙的没有信息,认为上海已经“鸣放”的不过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还有好多掩藏在看似平静的河流表面的是波涛汹涌的暗流,他认为”很多盖子还没有被揭开,据他说对“鸣放”有“六是”理论,“一是怕打击报复,怕党和政府没有信心改正,怕批评对象是不倒翁,是搬不动的石头,怕领导用两点论反驳。总而言之,是害怕批评“不倒”共产党反被“打击报复”^②所以尽管党满腔热情的邀请他参加会议提供意见的时候,他表示出没有信心,除非是把他所批评的对象挑几个出来“枭首示众”才过瘾,因此以旭东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开始怀疑他的用心。第三,谈到整风的方针政策与方法时,陈先生鼓起勇气提出了一系列和党的方针政策争锋相对的措施,中央主张应采取即严肃又认真的和风细雨的方针,要先从县以上单位的领导干部做起,除了对于严重违纪的同志外一般不给予纪律处分,但是陈先生认为要不分阶段的齐头并进,在每一个角落,特别是在死角里鸣放起来。并提倡“搬石头,算旧账”“要挑几个出来”有效的“处理”了,这一点被评论为是对中央整风精神的歪曲。谈到党的干部政策与党的纪律问题时,陈先生像对待其他右派分子那样采用了拙劣的两面手法,假借群众名义说话,斥责有着铁的纪律的党是“无赏罚,无是非”。

当然,在历史的论战时期双方都是各执一词的,我们需要以怎样的理想的眼光去看待这些言论呢,尤其是在哪个言论及其不自由的年代,这些言论是否

^①《上海右派集团总管孙斯鸣妄想建立反党基地和陈仁炳彭文应结成核心组织培植实力搞乱司法工作借口徐汇区事件向党进攻》,《文汇报》1957年7月14号第2版。

^②《陈仁炳的反党行径》,《文汇报》1957年6月28号第2版。

就一定要锱铢必较有一定要与思想的高度——对应呢，历史只有交给它自己去证明。

二、背离社会主义——陈仁炳民主思想被批判

据一些同事的检举和揭发他们认为，陈仁炳具有很强的“撑腰思想”和“惩办主义”（陈仁炳在上影的五次座谈会事件）例如唐辛伯在《上海市中医学会举行座谈会批驳揭发沈志远、陈仁炳、夏高阳等挑拨卫生界的反动言行》《上影工作人员举行座谈会揭露陈仁炳五次放火》^①（《文汇报》1957年6月26号第2版），在舒绣文的《我的揭发（暴露了陈仁炳破坏上影同仁团结的阴谋）》（《解放日报》1957年6月25号第1版中都提到了这一点，^②他们认为陈仁炳经常“口头马克思，肚里法西斯”^③对于党的路线长期吃质疑态度，不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倒是到处煽风点火严重影响了党内外的团结工作。）

关于“无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亲美的中间路线”^④周予同等复旦历史系教师的揭发下指出，陈仁炳阴谋篡夺上海话剧事业的领导，《解放日报》1957年8月18号第5版^⑤例如在吴松《陈仁炳的“另外一条道路”是什么？》《解放日报》1957年6月28号第2版中都予以了揭发和披露。关于“资产阶级的落后与腐朽”。^⑥在《血液里渗透着资产阶级思想毒计——陈仁炳猖狂反党蓄谋已久》这篇文章中指出，“陈仁炳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一贯持反对态度，想走另外的一条绕道路！”在陈仁炳工作的复旦大学，曾掀起了大规模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民盟复旦大学整风小组谈家桢和朱伯康等人列席代表发言，在发言中，他们首先从阶级分析的观点说明了陈仁炳所以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右派的骨干分子和投机取巧的政治野心家和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的炮手并不是偶然的，他的家庭出身，学校教育和工作经历都让他的血液里都渗透着资产阶级思想的毒汁，陈仁炳所写的若干文章所表现的思想，都说明了他政治思想上完全是资产阶级那一套，在方向上梦想走“第三条路线”甚至从1947年开始就和罗荣基接近，1949年正式投靠了右派集团^⑦

^① 《上影工作人员举行座谈会揭露陈仁炳五次放火》，《文汇报》1957年6月26号第2版。

^② 舒绣文：《我的揭发（暴露了陈仁炳破坏上影同仁团结的阴谋）》，《解放日报》1957年6月25号第1版。

^③ 王西彦：《暗无天日》《文汇报》1957年8月30号第二版。

^④ 《血液里渗透着资产阶级思想毒计——陈仁炳猖狂反党蓄谋已久》，《文汇报》1957年9月1号第3版。

^⑤ 吴松：《陈仁炳的“另外一条道路”是什么？》，《解放日报》1957年6月28号第2版。

^⑥ 《陈仁炳的丑态》，《文汇报》1957年6月26号第2版。

^⑦ 《血液里渗透着资产阶级思想毒计——陈仁炳猖狂反党蓄谋已久》，《文汇报》1957年9月1号第3版。

另外在个人生活作风方面，有资料补充说明了一些，来揭示他们认为的“陈仁炳的丑态”。在蒋介石的统治下，一般大学都有一科“三民主义”课程，而且还是每个学生都必须学习的必修课。在当时上海非常有名影响力也很大的圣约翰大学，陈仁炳就负责主讲这门课，那时一个班上有300来个人，在一个礼堂上课，但是由于大家对他讲的那一套并不感兴趣，所以去听的人寥寥无几。陈仁炳那时对来上课的学生非常关注，倒不是因为对工作负责，而是因为有一个女同学长得非常漂亮，下课后可以请她去跳舞。平时，陈仁炳除了上课以外，对学生的作业，从来不过问，都是由他的助教负责处理，自己则老是跑舞厅。女同学如果拒绝了他的邀请，他就会对这位“不识抬举”的女学生的试卷非常“关心”了，本来应该得“甲”的，他会改个“丙”，以示“警戒”，有人问他为什么老是跑舞厅，他就说是体验生活。当时，学校里有很多人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四斯主义”所谓“四斯”就是“嘴上马克思，肚里大拉斯（钱），行动法西斯，脚下仙乐斯”（舞厅名）。报上只登了“三斯”漏了他见钱眼开的本质。作家王西彦在上海作协组织的反右派斗争中发言补充道“我并没有对陈仁炳谈什么问题，我在那次民盟召开的会上，向朋友们谈起我的生活遭遇，说感慨暗无天日，想不到这个陈仁炳利用去攻击党。我为了这件事，想沈致远提过抗议。我说这个话是我自己不好应该检讨”李天际揭露了陈仁炳在“上影”召开的五次座谈会上放火的事实。他说道，在座谈会上有人提意见，陈仁炳就抓住机会大事发挥，煽动情绪，有人要提出了改进的办法，他就马上打断和压制，他还指出，陈仁炳说“上影”党员升级，非党员不升级是不符合事实的！^①大家不明白，为什么陈仁炳有那么多敌对情绪，这是否是从团队愿望出发？另外，为什么要抹杀解放后电影工作成绩，歪曲事实，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座谈会帮助大家对党靠近了还是离开了？电影艺术家从来就有靠近党靠近进步力量的传统。陈仁炳这种做法显然是对电影艺术家们的利用和侮辱，企图把他们拉到右派的泥潭中去，艺术家必须提高警惕，揭穿他的阴谋！按照这样的说法，陈仁炳的民主思想在这里似乎走上了一条歪曲的错误道路，成了积极靠近党并忠于党的艺术家们的愤怒和不满！解放后，陈仁炳摇身一变，居然讲授起“新三民主义”来，并且还写书呢。内容如何，报上已早有揭发，据说陈仁炳把自己的妻子送到了菲律宾自己则在上海乱搞男女关系，解放后还依然如此。^②在“抗

^① 阿颂：《陈仁炳的丑态》，《文汇报》1957年6月26日第2版。

^② 阿颂：《陈仁炳的丑态》，《文汇报》出处同上。

美援朝”“三反”“五反”等运动开展时，他还到处做演讲，做报告，伪装得非常积极，因此许多人被这些假象蒙蔽，误以为他是积极进步分子，其实是一个野心家！

这些来自于文艺界的揭发，似乎展示了另外一面的陈仁炳，至少，不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追求民主与自由的先驱勇士，成了一个嘴脸丑恶的阴谋活动家。是危言耸听的“污蔑”还是不容争议的事实，我们已无从知晓，但仅从目前手里的资料来看，问题确实很多，我们能相信一种思想，能坚定一种信仰，也许我们只是不能将这些光芒与暗疮自然地联系到一个人身上，历史就是这样，让人捉摸不透却又甘心臣服，因为——历史终究会还民一个真相。

三、曲解党派关系——陈仁炳民主思想遭驳斥

从1949年建国以来，我国就一直是一个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多党合作的国家，这样的关系，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制和多党制，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的执政党只有一个，但是，在这一问题认识上，就手头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陈仁炳对这个观点的认识很不一样，首先陈仁炳对民盟的性质和地位重新定义了他认为“民盟是第二大党，不是党的帮手”^①

但我们知道，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是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参政党，是主要由从事文化教育以及科学技术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

中国民主同盟于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成立，当时的名称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其时，由于“皖南事变”的发生，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遭到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危机四伏。国共两党以外一些主张抗日的政党和人士，迫切希望联合起来，为坚持团结民主抗日而斗争。于是，即以部分国民参政员于1939年11月成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为基础，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参加者有：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的成员及其他人士，公推黄炎培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不久以后，黄炎培便辞去了主席职务，推举张澜任主席。1941年10月10日，在香港的民盟机关报《光明报》发表《中

^① 马国亮 王欲骨：《陈仁炳蓄意损害党的威信》，《解放日报》1957年6月16日第二版。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简称“十大纲领”）。1942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遂成为集合“三党三派”的政治党派。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最初的政治主张是“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加强国内团结”，并积极参加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宪政运动。

①

1946年1月，民盟参加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在政治协商会议和国共两党和谈过程中，民盟与中共代表团密切配合，力促和谈成功。与此同时，参加和支持学生民主运动和广大人民群众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一批优秀的民盟盟员如李公朴、闻一多、杜斌丞、杨伯恺、于邦齐等在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尤其是在反对国民党非法召开“国民大会”的斗争中，民盟与中共一致行动，拒绝出席，并先后将投靠国民党反动派的青年党、民社党清除出民盟。

1947年10月，国民党政府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月，民盟总部被迫解散。民盟地方组织和盟员转入地下斗争，民盟的海外组织开展了各项活动，继续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1948年1月，民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成立临时总部，公开宣布同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为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同年5月，民盟与各民主党派一起，通电响应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口号”。1949年3月，民盟总部由香港迁到北平。同年9月，民盟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筹建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民盟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为民盟的政治纲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新中国人民政权工作和国家事务管理，推动盟员和民盟所联系的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特别是在参加国家文教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56年2月，民盟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口号。为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民盟积极发挥作用，就知识分子问题和文化教育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有远见的意见和建议。1957年，由于“左”的错误，特别是“反右”扩大化，使民盟受到严重挫折。②

①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光明报》，1941年10月10日。

②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光明报》，1941年10月10日。

中国民主同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是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参政党。中国民主同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时刻，由主张“团结、民主、抗日”的政团，于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组成的，当时的名称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民主同盟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坚持抗战，争取民主，反对内战，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英勇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民主宪政运动、政治协商会议、国共两党和谈、反对国民党当局召开“国民大会”的斗争中，与中国共产党密切配合，共同战斗，锻炼了自己，纯洁了组织。1947年，中国民主同盟被国民党当局宣布为“非法团体”，总部被迫解散。中国民主同盟在艰苦环境中，坚持斗争。1948年1月，在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上，制定了和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的政治路线，与中国共产党一道为建立和平、民主、统一的新中国而斗争。1949年1月，中国民主同盟公开宣告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民盟的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

所以单方面的把民盟解释成是党的帮手不是一个科学的界定性质地位的概念，只说明了民盟的作用，而没有给民盟的地位给以界定，从性质上来看，民盟还是一个非执政党派的民主党派，而不存在什么谁是第一党，谁是第二党之说。这样的表述在当时那个年代如果要严格的来看的话是可以扣上上纲上线的喧宾夺主的帽子的。^① 1957年，民盟复旦大学整风小组在对陈仁炳等右派分子错误总结大会上，崔明奇和胡其安等人指出，陈仁炳实质上是充当了罗荣基反党集团的打手，并最终成为这个集团驻上海和华东的一员主将，在过去的八年时间，他们想通过这种小团体的方式逐步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表现包括拉拢骨干分子建立上海领导核心，发展基层壮大队伍，制造“人多势众”以便达到和党分庭对抗的目的。在1956年间，民盟一下子从400多人发展到了三四千人，他们用请客跳舞封官许愿的方法拉拢群众，壮大队伍。民盟选举以后，各个右派分子被分别安插到民盟上海市委各处大部分主任和副主任或委员上海市委就成了张罗联盟在上海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指挥所。^②

第二，关于统战部的作用——陈仁炳的“统战部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一说是否站得住脚呢？也是一家之言罢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

^① 《民盟市委常委紧急会议决定停止陈仁炳彭文应盟内职务会上无情揭发上海右派分子与罗隆基的小集团阴谋活动》，《解放日报》1957年7月1日第1版。

^② 《血液里渗透着资产阶级思想毒汁——陈仁炳猖狂反党蓄谋已久》，《文汇报》1957年9月1日第三版。

部(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of CPC Central Committee)简称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统战部或中央统战部，是中共中央主管统一战线工作的职能部门。从五十年代初期开始，中共中央就为统战部门确定了“了解情况，掌握政策，调整关系，安排人事”的基本职能。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后，爱国统一战线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统战部门的基本职能内涵加深了，内容更加丰富。1948年9月，中共中央先后发电，决定成立新的“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负责管理“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国内少数民族工作、政权统战工作、华侨工作及东方兄弟党的联络工作”，并具体负责筹备召开新政协的工作。^①

统战部的工作还是涵盖很多方面的，例如调查研究统一战线的理论和重大的方针政策，组织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向中央反映情况，提出开展统战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负责联系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及时通报情况，反映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研究、贯彻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及对民主党派的方针、政策；落实中央关于发挥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作用的工作；支持、帮助各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负责调查研究、协调检查有关民族、宗教工作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联系少数民族和宗教界的代表人物；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举荐工作；协同有关部门与达赖集团等国内外敌对势力分裂祖国的活动进行斗争。负责开展以祖国统一为重点的海外统战工作；联系海外有关社团及代表人士；做好台胞、台属的有关工作。负责党外人士的安排，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培养、选拔、推荐党外人士的工作。负责联系全国工商联，联系港、澳、台及海外工商社团和代表人士。调查、研究并反映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物的情况，协调关系，提出政策建议。调查研究党外知识分子的情况，反映意见，协调关系，提出政策建议；联系党外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负责开展海内外统一战线的宣传工作。负责指导地方党委统战工作和统战部门负责人的培训工作，协调政府各有关部门的统战工作；代管全国台联、黄埔同学会、欧美同学会、和平统一促进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宋庆龄基金会、全国工商联等有关中央党群机关的工作。完成中共中央交办的其他任务。

在抗战特殊时期，有一些破坏统一战线的事件发生，但是，并不能简而言之的一概而论，认为这个组织已经孱弱到不能再发挥作用了，这样的论调是极

^①《民盟个地方组织发出共同呼声坚决要求民盟向左转》，《文汇报》1957年6月17日第1版。

为不负责任的。整风运动小组认为，陈仁炳反党集团在操纵了上海盟务的实际情况以后，尤其是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和“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陈仁炳等人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活动很猖獗，一方面，陈仁炳运用很巧妙的方法把许多进步的同志排斥在民盟市委会之外，而又借口说某些常委很忙，把有些积极向党靠近的常委们排斥在每周都要举行的民盟市委工作会议之外，这样，他就大权独揽为所欲为了。为了进一步独立行事，据他们说，。

陈仁炳有和他的亲信一起隔断了某些同志和中共上海市委的统战部的直接联系，重要的工作和决定都由他自己自行决定，直接开展工作。后来大家很多重要的工作他都没有和统战部联系商量过，而且，他代表民盟参加的市政协正副秘书长会议之后，其中，很多党的负责同志的重要指示，他都没有向民盟市委工作会议传达，以至于民盟市委工作会议常常搞不清楚下一步的工作方向在哪里？下一步该干些什么？这样上下隐瞒暗箱操控的做法大大削弱了统战部的作用，就像是逐渐的装作好像是党的意思，用错误的方向企图把民盟的工作引导到反党的道路上去，他一再宣传“统战部不能解决问题！”^①来打击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的威信！

陈仁炳还认为民盟代表的利益——“知识分子的大家庭，真正代表知识分子的利益”^②民盟监督的权力“要不断扩大规模加大对党的监督，党要广开言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民主同盟遵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参加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与国家事务管理；推动盟员和民盟所联系的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参加各项民主改革，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民主同盟同中国共产党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广大盟员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民主同盟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确立了中国民主同盟参政党的性质、地位、作用，实现了工作重点转移；积极履行参政党职能，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①《陈仁炳的反党行径》，《文汇报》1957年6月28日第二版。

^②《陈仁炳的算盘》，《文汇报》1957年6月17日第3版《笔会》专刊“群言堂”栏目。

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服务，为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服务，为实现祖国统一服务，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服务。

第四章 陈仁炳的晚年岁月

一、曲折漫长的平反道路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发动到1976年结束,长达十年之久。其间不止一次地宣告取得了重大胜利、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它也确实在一定的阶段,部分地达到了某些既定的战术目的,打倒了所要打倒的政敌;然而,历史最后宣告它的失败而告终。那末,先它九年发动的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是不是取得了如当时所说的“伟大胜利”呢?在1957年下半年的运动中和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划定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据有关部门公布的数字为53万多人,有人说实际上大大超过此数。即以53万来说,这个占了当时估计总数500万知识分子的十分之一的右派,作为反右派斗争的对象,们遭遇了铺天盖地的批判与控诉

上海市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陈仁炳被打成“右派分子”后,经历“七斗八斗”,便被送入上海社会主义学院学习。1958年9月至年底,上海“著名右派”48人,又被送往上海县颛桥农村“集中学习”。分为三组,陈仁炳属第一组,组长为陆诒;第二组组长为徐铸成,第三组组长为沈志远。他们住在农村,上午在田间劳动,下午写交代。12个人睡一个房间。除了右派外,还有监督人员,生怕有人自杀。陈仁炳在劳动期间患心脏病,经第四人民医院抢救未死。不久妻子离婚。1960年12月“摘帽”回学校教书。1966年文革开始,又被“监督劳动”9年,做木工,当下手;每月工资一度被减至57元7角。当时,他的房租要40元,只剩下17元7角生活费。不得已,他只好放弃原本在淮海中路的宽敞住房,迁居到普陀区两间8平方米的小屋。1972年患肺炎、心肌炎,实在干不动体力劳动;1975年,陈仁炳65岁,获准退休,从此他再也不必去做木工了。退休金每月57元。1981年恢复教授待遇,住房、医疗均有了保障。1980年,绝大多数右派分子获得平反,而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等96人“不予改正”。陈仁炳是这5名中央级未获改正的右派当中唯一的一个活着看到自己没有平反的人。^①陈仁炳的新居坐落在上海离徐家汇不远的衡山路和吴兴路交叉口的四栋高级的新公房中。这一地段在上海素以高级住宅

^①王树奎口述 王岚采访《“文化大革命”后参与上海落实政策工作中难忘的人和事》《党史文苑》2010年8月上半月刊。

区著称，尤其是绿树蔽天行人稀少的衡山路令人陶醉。这些新公房的主人都是当时上海的一些名人，包括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和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曹天钦夫妇，上海市委宣传部前部长王元化，著名学者孙大雨和著名表演艺术家秦怡等。

常年的右派生涯平反未果之路给晚年的陈仁炳带来了难以言说的心灵上的打击。他多次同和他有着世交兼邻居关系的王元化聊及自己这一难解的痛楚，无法接受后者叫他“看得淡一些”的多次劝解。“陈仁炳是抑郁而终的”，王元化回首往事时，两次强调了“抑郁”二字。不少熟悉陈仁炳的亲朋好友也都这么认为。陈仁炳对“文革”期间他的家庭和他的家族遭受的苦难痛心万分，他曾对友人称自己是“还活着的真右派”。陈仁炳多次表示，他对有关方面既承认他解放前后曾“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是又“不予改正”的现状耿耿于怀。

1991年十二月中旬，陈蕴辉来电说十二月九日上午陈仁炳过世了，他的追悼会还是很隆重的。中国现代史上被定为中央级“真正”右派的最后一位健在者就这样地走了。

二、忧郁平淡的漫漫人生

在人才荟萃的复旦大学历史系的老师中，陈仁炳是有些传奇或曰神秘色彩的教授。他于1936年获得美国密执安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解放前后曾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53年起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据曾经在复旦求学的徐有威回忆，在复旦大学，据其他学长们介绍说，陈仁炳在上课时，曾经突然就离题万里地谈起了美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谈到美国30年代罗斯福新政时的故事时，素无什么表情的陈仁炳，竟会突然变得眉飞色舞，如同换了一个人。学生向他请教题目，有一题目竟是有关Ph.D（博士）名称的来源。一次课后在教室门口看到陈仁炳，就向这位1936年毕业的美国博士请教了。陈仁炳一本正经地进行了仔细地解释，还引用了他和他的前妻在美国获得博士的亲身经历作为佐证。唯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次不知谈到什么话题，他在课堂上讲了一个非常冷僻的成语“唾面自干”，同时仔细地介绍了这一成语故事的出典。到了1985年6月间，全班同学和系里的全体老师拍毕业合影时，陈仁炳自然也去了。在所有的老师中，只有两位老师西装革履，其中一位就是陈仁炳，

其余的一律是中山装甚至长袖衬衫。有趣的是，周谷城先生潇洒地拿着一根拐杖，而陈仁炳却拿着一把雨伞。记得那天天气晴朗，没有下雨的迹象。西装革履外加雨伞式的拐杖，不免令人想起了古典电影中看到过的英国绅士。^①

据陈仁炳的学生徐有威讲述，当时，他和正在上海的空军政治学院任教的大学同学王维江们都想帮陈老先生写一本回忆录，所以曾几次到访过陈仁炳的家中和他有过比较深入的近距离访谈交流，病做了录音记录。1989年的初春，他们到陈仁炳家中拜访时，他们带了一束鲜花去的，陈仁炳一见到鲜花就笑了，显得非常高兴。复旦大学分给他的新居是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在当时的上海算是高规格住房了。厅中的一侧放着一架旧钢琴，钢琴上放着一本《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钢琴上方的墙上也悬挂着一个镜框，里面是陈仁炳的美国密执安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学位证书。据说“文革”期间，来抄家的红卫兵想撕掉这一证书，但是证书是羊皮做的，一下子撕不破，只好揉成一团，扔在墙角，被陈仁炳拣了回来而得以“余生”。厅的另一侧墙上也悬挂着一个镜框，里面是一幅由民盟上海市委赠送的写满各种字体的“寿”字的百寿图。那天陈仁炳穿得整整齐齐接待了他们，就像在讲台上一样，精神抖擞，思维清晰。^②

到1990年，仅仅时隔半年，当他们再次拜访陈仁炳是，那个时候的陈仁炳已经躺在床上了，神情恍惚。他的妻子陈蕴辉医生因为年迈已经不能再照料，所以自己出钱为他请了一位特别护士进行护理。期间，陈仁炳拖着病弱的身体断断续续地告诉我说，现在开始评社会科学系统的院士了，他的老朋友沈志远（一九五七年时任民盟上海市委主任委员，经济学家，一九五七年被划成右派分子）排在第一位，他自己应该排在第二位。他给我们上课时用的上下两册的教材《英文世界史学名著选读》，希望能够出版。“周谷城应该给我的书名题签，我们毕竟在一个教研室工作过。”当时的周谷城已经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了，我不禁愕然。陈蕴辉在外面的房间听到了我们的谈话，这时插话说，不要听他的，他已经有些幻想症了。此时正值“六四”风波结束不久，陈仁炳预感生前是看不到自己右派问题的彻底解决了，其心情之恶劣是可以想象的，而我也深深感觉到他的这种心情。晚年生活中，陈仁炳鲜有发表各种言谈，只潜心致力于学科的教育和科研的钻研，平淡忧郁的晚年生活就这样悄然地结束了。

^①徐有威：《唾面自干：陈仁炳的晚年》，《百年潮》2003年第8期。

^②徐有威：《唾面自干：陈仁炳的晚年》，出处同上

结 语

百年沧桑，如梭的往事纷纭而至，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曾经领先于东方的国家，民主化进程尚且不是一帆风顺，中国也必定艰险重重，面临着更加坚信复杂的局面，从摆脱帝国主义强势欺压完成民族独立开始，经历了近代中国的民主思想与反对专制的斗争清朝中后期，以皇室要员牵头，开展了以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师以长技以制夷、追求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也第一次让沉睡黑暗中的中国沐浴到了些许民主的光芒。在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中诞生的早期资产阶级维新运动主张发展工商，兴办西学，革新政治，虽未形成完整的体系，也并未付诸于行动但却成为“康梁思想”的来源。康梁紧跟其后提了“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改革，提倡发展为戊戌变法运动，具有进步性、爱国性、启蒙性。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论战提出“民族、民权、民生”推翻封建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使民主共和深入人心，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孙中山关乎“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新思想”，推翻帝制，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反对袁世凯的专制独裁和复辟帝制的护国运动，抗战期间，中共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治民主建设，内战期间《双十协定》的签订以及重^①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中国近代民主化的列车并未停下匆匆前行的步履，到了现代中国，建国之时开国大典的举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颁布，虽然经历了是“文化大革命”对民主和法制的践踏，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主法制建设将悬崖边的马车扭转回势，民主建设的重回正轨蒸蒸日上，时至今日，教育体制改革已经试点展开，儿童妇女的权益保护力度相比之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如火如荼，全民民主意识和文化素质全面提升，我们看到了一个富强民主的大国正在奋然觉醒和崛起。

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和文革十年的浩劫已经渐渐远去，再回首，近代中国亦步亦趋探索文明与进步的峥嵘岁月仍然是挥之不去的记忆，向社会主义鼻祖“老大哥”苏联模仿和学习，曾是我们这个常以地大物博天朝上国自居，曾愚钝地要“量中华之物力，借与国之欢心”被豪放的为列强打开国门的让人又爱

^① 陈奉孝：《五七年右派思想认识的局限性》，《历史解读》2010年4月30日。

又恨痛心疾首的大民族的引以为豪的光荣传统，可是，苏联的不老神话最终却破灭了，体无完肤，覆灭地支离破碎，自 1922 年 12 月 30 日，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布成立，由俄国革命领袖列宁亲手缔造的这个红色帝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国土面积占全球的六分之一，并且很长时间是美国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对手，曾一度作为以中国为首的一部分东方国家顶礼膜拜狂热追求的“苏联老大哥”，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 1991 年的圣诞节那天，他的最后一任国家元首戈尔巴乔夫亲手埋葬了这个帝国。作为一种新的政权形式，苏联的这个相对走向民主的社会主义模式与当时以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独裁政治金元外交，资本剥削等资本主义政权针锋相对，给这个世界上太多的人，尤其是底层的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人民希望这一药方能够根治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和社会不公等人类社会的痼疾。

但随着历史的诸多谜底被解开，人们发现的只是无数阴谋与罪恶。说到底，在任何以个人利益与自由为代价的土壤上，都不会开出整体社会自由和民主的幸福之花！中国是步苏联后尘的另一个向往民主与进步的社会主义国家，站在前苏联，这个庞大帝国解体 20 多年后的今天，回望那段赤色力量初起于沙俄躯体，并最终将夹杂着梦幻和铁血的理想付诸于现实的岁月，人们往往会震慑于历史的强大解构力量，曾经的豪言壮语和美好梦境的背后，何尝不是扭曲的理性压倒人类价值所导致的残暴于灭绝人性？建筑在人性和自由基础上的包容与宽容就理应被国家的强大与光辉所取代？中国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是“阳谋”亦是“人祸”还是“浩劫”都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年代最终流和淹没在产在历史的宏河中，那些曾经泛起的朵朵浪花也都付之东流了！

这里虽是在探讨陈仁炳先生的民主思想，探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但执笔至此，笔者还再次联到了托克维尔的著名预言，早在 19 世纪，他就已经预言了的关于 20 世纪的人类戏码，他将美利坚与俄罗斯堪称为人类世界最后的两个伟大民族 认为他们将最终突出于各国行列之前，直至今日，人们都在赞叹托克维尔预言的精准，20 世纪恰恰是这两个民族的世纪，但更加重要的则是托克维尔对语言的阐释：美利坚人与一切禁锢斗争，而俄罗斯人则以人类相斗争，美利坚人的胜利是依赖农夫的锄头，俄罗斯民族的胜利则是仰仗战士的利剑。回过头来再看苏联走过的历史，托克维尔的预言和其睿智！最终，手持利剑与人类作斗争的俄罗斯用帝国的解体宣告失败！探讨美利坚民族和俄罗斯民族胜利

与失败的问题上，中华民族绝不是置身事外的看客，显而易见，我们能清晰地
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看到自己曾经的身影，理应明白，任何凌驾于人
性的所谓理想与宏愿，都只是用来隐藏祸心的华丽外衣！修复好破碎的心，重
拾信仰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喜的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乃至将来，我们仍然
有信念，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将民主与自由，开化与进步作为最高的理想和信
仰！

逝者如斯，就像文中的主人翁，陈仁炳老先生和他的父亲，甚至祖父，一
代又一代的民主革命的先驱和斗士，对这些人，笔者总是投以赞许的目光和由
衷的钦佩，我想，别的暂且不去讨论，单单一点，便足以让人哲服，那就是他
们是有信仰的人，他们信仰民主和自由！因为我自己做不到那样纯粹，即便是
真的有过信仰，也总是会在许多现实的无奈中委曲求全，怯懦退缩甚至是无望
地半途而废，所以，至今，我没有任何真正的坚定的信仰，想到这些，着实有
些惭愧难当！谨以此文献给那些有信仰，并为此不懈追求的人

致 谢

完成硕士论文最后一章之时我并未停笔，我知道此时有必要对自己三年的研究生学习生活加以小结。虽然在此期间参加了近两年的本专业的系统学习，完成了各科专业及选修课程，并顺利通过了各科考试，但仍深感离师长同学和朋友对自己的殷切期望距离尚远，所以未敢有丝毫自满松懈之念。我深知今天所取得的点滴成绩与你们对我的关心指导和爱护支持是密不可分的。在此，请你们接受的深深的感谢。

昨天，是传说已久的世界末日，传说这一天的太阳落下以后再也不会升起，可是，今天，冬至日的北京，寒气逼人，窗外，银装素裹的一片雪白天地，丝毫没有世界末日大逃亡的混乱与惊慌，也不是一片死寂般的阴霾，反而天显得格外的高，一切顿感格外的清净！清晨的太阳一如既往的冉冉升起，敲击玩结语的最后一行文字，我站起身，拉开窗帘，看着朝霞的余辉影射着窗台上火红艳丽的玫瑰，我如释重负，眉头舒展，一是欣喜末日论终归成了泡影，二是庆幸还能再次为自己庆祝生日，当然，另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今天，我完成了我的硕士毕业论文，虽然我深知比别同学迟了不少，但在敲击完最后一个段落的瞬间，随着这篇硕士毕业论文的最后落笔，我三年的研究生生活也即将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回忆这三年生活的点点滴滴，从入学时对研究生生活的无限憧憬到课堂上对各位老师学术学识的深沉沉湎，从奔波于教室图书馆的来去匆匆到业余生活的五彩缤纷，一切中的一切都是历历在目，让人倍感留恋，倍感珍惜。

百种滋味，涌上心头！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导师洪小夏老师，我想写到这里，不免又有些落于俗套的歌功颂德。但于我，这一页无论如何不能轻易的从生命的篇章中草草翻过，很多伟人、名人为我所崇拜，可是我更急切地要把我的敬意和赞美献给一位平凡的人——我的导师，洪小夏教授。我知道，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而您却是最最尊敬的老师。三年前，踌躇满志的我报考了北京的首都师范大学，还能回忆起在北京半工半读的四个多月不分日夜的苦战岁月，笔试第一的成绩顺利的拿到了面试通知书，但贪图玩乐高兴过头的我却疏于学业，毫无准备，理所

当然，面试之际表现地一塌糊涂，笔试第一的好成绩考生却被心心念念的高等学府拒之门外，我心灰意冷遭受巨大打击意志消沉，在从头再来和放弃之间痛苦挣扎的我，申请调剂了上海师范大学的中共党史专业。还清晰地记得那个4月的午后，拉家常似亲切的最后面试结束后，我之前遍布乌云的心情瞬间转晴了。是老师给我打开了一扇门，给了我再一次继续学习和深造的机会。这一点，没有人比我更深知，倘若没有这一次人生的转机，就一定不会今天独立，坚强的我。时过境迁，在选导师筹备毕业论文之际，又是洪老师，再一次在危难之中为我解了难，在负担着众多大型科研任务和学科点繁忙的工作任务以及十几个师兄师姐的指导工作的同时，您接收了我做您的学生。感谢您对我毕业论文从选题到执笔写作，再到最后定稿所付出的辛劳！感谢您在这个我即将离开上海师范大学的最后的炎热夏天里对我人生方向的指引！谢谢！您对我的严格要求和高屋建瓴的指导将使我终身受益。特别是您严谨的治学态度、孜孜不倦的学者风范及待人处事的随和真诚，给我树立了终身的学习榜样。给我们学科点以及所有听过您上课的学生们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大家都说听您的课很过瘾，旁征博引，生动详尽不说，连每一个历史事件，每一次大小战役，每一份签署的文件条约的时间地点您都如数家珍，真是让我望尘莫及之余，不由由衷的佩服！因此，我恭敬的将这篇硕士毕业文献给我的老师——洪小夏教授！

在上海师范大学的三年时光和我一起生活近两年的各科老师同学也给了我巨大的帮助与支持，和你们在一起学习，生活，出游，共事等等共同奋斗的日子更让我难以忘怀。商红日院长平易近人的谆谆教诲，单冠初老师诙谐幽默的教授方法，吴珍美老师细致入微的关怀，宋佩玉老师独特的个人风范以及贺朝霞老师百忙之中和我将心比心的促膝畅谈，还有蒋硕亮老师，麻莉老师，教我公共英语的潘淑兰老师，谢谢你们！！重庆师范大学的刘耀辉教授，我大学的辅导员老师和最好的朋友之一，这篇论文有此雏形，也离不开你多少个日夜的圈圈点点的修改和指点！谢谢！毕业之日在即，我想，无论今后，我是在浩瀚的历史海洋中继续扬帆启程还是重新探索新的人生道路，不论铺在前方的前路是光明遍地还是荆棘当道，老师们的严谨的治学精神和为人作风都将使我受益终身，怎样言说都表达不尽，自己取得的点滴成绩无不凝聚着恩师的心血。

三年来和我一起学习生活过的同班同学，无数个我奔波在外学习工作的日子，班长积极尽责地通知我 项事宜，帮我递交各种表格文书，开展班级各种组

织活动，让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们有了大家庭的其乐融融之感，感谢班长丁志远！还记得2010年十月初到上海的那场“星光闪烁，博云盛宴”的新年盛会吗？感谢所有和我一起奋斗过的同事和伙伴，音响，灯光，道具，化妆师，舞蹈，主持搭档，感谢李建、王尚、孟红利！感谢整个上师大法政学院文艺部的成员们，你们辛苦了！没有你们就不会有那一场成功的晚会！也感谢王高萍，江泽通，没有你们，我们就不是10级中共党史专业！各位兄弟姐妹们，我们一起度过的那些开心的或是失落的峥嵘岁月！少了你们谁都不行！一直为能在我们这个团结的充满热情与活力的集体中工作学习和生活而感到骄傲和幸福，和你们相处的那些时光也是我研究生生活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三年来，忙于社会实践，学业不精，疏于联系，对大家的关怀和照顾不周，在这里，和大家说一声对不起！

求学打工在外近十年，四年的本科生活，两年的工作生涯，三年的研究生生涯，从重庆到北京到上海，心里最放不下的还是时刻牵挂的父母，没有你们的养育，栽培和支持，就没有今天的我。今年国庆，有幸和父亲妹妹在北京相聚，发现曾经在心中高大无比的父亲已经悄然老去，身体也大不如从前，岁月不等人，如今，生活上，他们还不时的支持我，关心我，鼓励我。经常问我钱够不够花，衣服穿的暖不暖，吃的好不好，睡得香不香，所以，除了相信个人奋斗，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相信友情，相信爱情，我永远最最相信亲情！独处之时，常常自责难当，因为这近十年的学业工作奔波对父母家人的照料非常有限，欠你们的实在太多太多，无言以表唯有加倍努力！

即将结束的研究生生活让我依依不舍，但我知道新的征程在等待着我，你们对我的关心和帮助将化为我继续奋斗的动力，时光荏苒，再回首，想起的竟是那一句“往事并不如烟”，因为，一切历历在目，亲爱的老师，同学，朋友，我不会辜负你们对我的关心与期望，我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之而奋斗！

每当友人离别之际，总会想起一首歌来表达内心的情愫

南风又轻轻的吹送，
相聚的时光匆匆，
亲爱的朋友请不要难过，
离别以后要彼此珍重，
绽放最绚烂的笑容，
给明天更美的梦

参考文献

一、报刊文献

- 1、《陈仁炳遗体告别仪式举行》，《文汇报》1990年12月23日第2版；
- 2、《在民盟右派向文艺界猖狂进攻中莫筠是陈仁炳的帮凶》，《解放日报》1957年9月5日第4版；
- 3、唐辛伯：《上海市中医学会举行座谈会批驳揭发沈志远、陈仁炳、夏高阳等挑拨卫生界的反动言行》，《上海中医药杂志》：1957年第9期；
- 4、陈仁炳：《向党向人民认罪交代》，《解放日报》1957年9月4日第7版；
- 5、《血液里渗透着资产阶级思想毒计——陈仁炳猖狂反党蓄谋已久》，《文汇报》1957年9月1日第3版；
- 6、夏彤《陈仁炳阴谋篡夺上海话剧事业的领导》，《解放日报》1957年8月18日第5版；
- 7、《阴谋放火烧掉上影党领导——白沉是陈仁炳的得力助手》，《文汇报》1957年8月12日第2版；
- 8、《陈仁炳交代空洞激起公愤民盟市委会议进一步揭穿这个野心家的嘴脸》，《解放日报》1957年8月12日第1版；
- 9、《右派分子陈仁炳等忠实执行的反动科学纲领本市社会科学界严厉驳斥同时揭发沈志远贯彻反动纲领的事实》，《解放日报》1957年7月24日第1版；
- 10、《上海科学界集中批判右派科学纲领—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揭露右派分子王造时杨兆龙陈仁炳尚丁许杰反动言行沈志远贯彻执行反动科学纲领的阴谋更遭到揭发和批驳》《文汇报》1957年7月24日第2版；
- 11、《上影继续揭露右派反动言行一向坤一贯是陈仁炳的打手》，《文汇报》1957年7月21日第2版；
- 12、《上海右派集团总管孙斯鸣妄想建立反党基地和陈仁炳彭文应结成核心组织培植实力搞乱司法工作借口徐汇区事件向党进攻》，《文汇报》1957年7月14日第2版；
- 13、《本市文艺界揭发右派分子滕白也是陈仁炳的帮凶胡淼年连续“放火”煽动闹事破坏团结》，《解放日报》1957年7月14日第1版；
- 14、《本市文艺界揭发右派分子滕白也是陈仁炳的帮凶胡淼年连续“放火”煽动闹事破坏团结》，《解放日报》1957年7月14日第1版；
- 15、《滕白也给陈仁炳的反动信》，《文汇报》1957年7月12日第3版；

- 16、陈仁炳：《陈仁炳的一支毒箭—虚心些，再虚心些——论怎样来“拆墙”》，《文汇报》1957年7月11日第2版；
- 17、《章罗集团驻沪“主将”枪法已乱陈仁炳吞吞吐吐交代》《解放日报》1957年7月12号第1版；
- 18、续磊：《上影之“火”（揭发陈仁炳的阴谋活动）》，《解放日报》1957年7月11日第3版；
- 19、陈仁炳《虚心些再虚心些—论怎样来“拆墙”（在市委宣传会议期间写的反党反人民的文章）》，《解放日报》1957年7月11日第3版；
- 20、《借〈展望〉周刊作为政治资本 冒人别人笔名到处自抬身价——陈仁炳招摇撞骗记》，《文汇报》1957年7月6日第3版；
- 21、《民盟市委紧急会议决定停止陈仁炳彭文应盟内职务会上无情揭发上海右派分子与罗隆基的小集团阴谋活动》，《解放日报》1957年7月1日第1版；
- 22、《陈仁炳的反党行径》，《文汇报》1957年6月28日第2版；
- 23、《陈仁炳玩弄花招企图蒙混过关》，《文汇报》1957年6月28日第2版；
- 24、《陈仁炳的丑态》，《文汇报》1957年6月26日第2版；
- 25、《复旦大学历史系全体教职员集会声讨陈仁炳王造时》，《解放日报》1957年6月28日第1版；
- 26、吴松《陈仁炳的“另外一条道路”是什么？》，《解放日报》1957年6月28日第2版；
- 27、《上影工作人员举行座谈会揭露陈仁炳五次放火》《文汇报》1957年6月26日第2版；
- 28、舒绣文《我的揭发（暴露了陈仁炳破坏上影同仁团结的阴谋）》，《解放日报》1957年6月25号第1版；
- 29、旭东：《鸣放与整风——评陈仁炳的错误论点》，《文汇报》1957年6月24日第2版；
- 30、《作家们投入反右派斗争》，《文汇报》1957年6月23日第1版；
- 31、刘子正《陈仁炳彭文应等是如何篡夺民盟上海市委领导权的？》，《解放日报》1957年6月20日第2版；
- 32、《陶雄王熙春等揭发陈仁炳反党行为》，《文汇报》1957年6月19日第5版；
- 33、《“生活不是苦了，而是大大改善了。”上海郊区农民严斥右派分子，要陈仁炳王造时等下乡去看看算算账》，《文汇报》1957年6月19日第5版；
- 34、兆洪：《陈仁炳和彭文应的猖狂活动到底是为了什么？》，《解放日报》1957年6月18日第2版；
- 35、《陈仁炳的算盘》，《文汇报》1957年6月17日第3版《笔会》专刊“群言堂”栏目；

- 36、《民盟个地方组织发出共同呼声坚决要求民盟向左转》，《文汇报》1957年6月17日 第1版；
- 37、尹大贻：《我对盟内右派分子的揭发(陈仁炳的错误路线、陆诒的错误言行)》，《解放日报》1957年6月17日第2版；
- 38、《陈仁炳挑拨离间的结果使国画家之间关系愈形复杂上海国画院成员集会予以揭发》，《解放日报》1957年6月16日 第1版；
- 39、瞿白音：《陈仁炳在电影问题讨论中干了些什么?》，《解放日报》1957年6月16日 第2版；
- 40、《陈仁炳唯恐天下不乱他到处活动和党“唱对台戏”-民盟市委机关干部支部大会予以揭发》，《解放日报》1957年6月15日第1版；
- 41、覃汉川：《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陈仁炳的错误言行》，《解放日报》1957年6月15日 第3版；
- 42、尹大贻：《再揭发陈仁炳的错误言论》，《解放日报》1957年6月15日 第3版；
- 43、《民盟上海市委机关干部支部大会一揭发陈仁炳挑拨党盟关系》，《文汇报》1957年6月15日 第4版；
- 44、《陈仁炳唯恐天下不乱，再上影挑拨党群关系》，《文汇报》1957年6月14日 第4版；
- 45、《民盟市委内部展开论争反对陈仁炳谬论揭露陈仁炳挑拨行为》，《解放日报》1957年6月14日第1版；
- 46、《解放日报》编辑部《论算旧账(社论)(驳斥陈仁炳的谬论)》，《解放日报》1957年6月14日 第1版；
- 47、吴南：《揭发陈仁炳的错误言论(在民盟市委机关干部大会上的补充发言)》，《解放日报》1957年6月14日第1版；
- 48、《陈仁炳对共产党整风方法有不同意见(民盟成员在市委宣传会议上的发言)》，《解放日报》1957年6月9日第2版；
- 49、《了解人，尊重人，关心人-陈仁炳代表的发言(书面)》，《解放日报》1956年8月17日 第8版；
- 50、陈仁炳：《市区代表联席会议上民主党派代表陈仁炳的讲话》，《文汇报》1951年4月30日 第2版；
- 51、陈仁炳：《圣约翰大学座谈会上愤怒控诉日寇罪行——陈仁炳教授指出：要化悲愤为力量；坚决反对美国武装日本》，《文汇报》1951年3月3日 第3版；
- 52、陈仁炳：《人口 资源 社会制度》《天风》1949年158期；

- 53、陈仁炳：《论新社会建设——中国建设 1945 上海》，1949 年 7 卷 6 期；
- 54、陈仁炳：《教会属于人民：以更坚定的信心迎接一九四九年》，《天风》1949 年（153）期；
- 55、陈仁炳：《孙中山精神那里去了？》，《启示》1949 年（新 4 期）；
- 56、陈仁炳：《启蒙运动的再开始：论新知识份子的任务》，《启示》1949，（新 3）；
- 57、陈仁炳：《美国第三党的过去与未来》《启示》，1949 年，（新 2）期；
- 58、陈仁炳：《再论和战》，《展望》1949 年 3（12）期；
- 59、陈仁炳：《革命只有一个》，《展望》1949 年 3（18）期；
- 60、陈仁炳：《解放妇女》，《展望》1949 年 3（16）期；
- 61、陈仁炳：《论政治道德》，《展望》1949 年 3（15）期；
- 62、陈仁炳：《论政治作风》，《展望》1949 年 3（13）期；
- 63、陈仁炳：《鲁斯周以德合论》，《展望》1949 年 3（11）；
- 64、陈仁炳：《泛论和战》，《展望》1949 年 3（10）；
- 65、陈仁炳、杨卫玉、孟宪章：《新岁展望》，《展望》1949 年 3（9）期；
- 66、陈仁炳：《启蒙运动的再开始：论新知识份子的任务》，《启示》1949，（新 3）期；
- 67、陈仁炳：《基督教思想的宽度》，《天风》1948 年 121 期；
- 68、陈仁炳：《免于恐惧之自由》，《天风》1948 年 121 期；
- 69、陈仁炳：《逆流与合流：七七第十一周年的形势》，《展望》1948，（七七增刊）；
- 70、陈仁炳：《论政治变动》，《观察》1948 年 5（17）期；
- 71、陈仁炳：《如何拯救文明》，《展望》1948 年 3（8）期；
- 72、陈仁炳：《论民族·国家·政府》，《展望》1948 年 3（6）期；
- 73、陈仁炳：《迟暮北国冬景（北平通讯）》，《展望》1948，年 3（4）期；
- 74、陈仁炳：《论杜威之惨败》，《展望》1948 年 3（2）期；
- 75、陈仁炳：《论美国大选》，《展望》1948 年 2（24）期；
- 76、陈仁炳：《超越自由主义》，《展望》1948 年 2（22）期；
- 77、陈仁炳：《一个目标·一个方向：一个综合观点的评介》，《展望》1948 年 2（20）期；
- 78、陈仁炳：《冯玉祥之死》，《展望》1948 年 2（18）期第 3 页；
- 79、陈仁炳：《论政治隙缝里的教育：为教师节作》，《展望》1948 年 2（17）期 第 2 页；
- 80、陈仁炳：《北方在变！》，《展望》1948 年 2（14）期；
- 81、陈仁炳、孟起：《关于解聘教授与开除学生、读报偶笔》，《展望》1948 年 2（12）期；
- 82、陈仁炳：《为人道主义呼吁：由废止体刑问题说起》，《现实文摘》1948 年 2（11）期；

- 83、陈仁炳：《论官毒：官僚政治与民主政治之消长》，《展望》1948年2(7)期；
- 84、陈仁炳：《论知识份子的天真》，《展望》1948年2(5)期；
- 85、陈仁炳：《世纪末期的悲哀》，《天风》1946年42期；
- 86、陈仁炳：《海外寄來的一個花球（通信）》《独立评论》1933年，(33)期；
- 87、陈仁炳：《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变迁》，《沪江大学月刊》1931年21卷（2/3）期；
- 88、陈仁炳：《在燕子矶上：南京的燕子矶就等于上海的黄浦江》，《沪江大学月刊》1931年20卷（3）期；
- 89、陈仁炳：《变商籁体诗试作》，《沪江大学月刊》1931年20卷（3）期；
- 90、陈仁炳：《现代青年病态生活》，上海各大学国语演讲比赛第三名《沪江年刊》1929年14期；
- 91、王翔：从《天风》看中国激进基督徒的政治表达（1946-1949）；

二、文集、资料集（按出版时间先后顺序排列）

- 1、陈仁炳：《走向民主社会》，上海：中国建设服务社，1949年3月；
- 2、复旦大学校刊编辑室编：《毒草集：批判右派思想言论选集之一》1957年8月；
- 3、复旦大学校刊编辑室编：《明辨集：批判右派言论选集之二》1957年11月；
- 4、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编：《怀念陈崇桂牧师》上海出版印刷公司承印，1992年2月。

三、回忆录访谈记录（按出版时间先后顺序排列）

- 1、王树奎口述，王岚采访：《“文化大革命”后参与上海落实政策工作中难忘的人和事》，《党史文苑》2010年8月上半月刊；
- 2、沈德溶：《回忆敬爱的陈崇桂老牧师》，中国基督教协会网站，《人物春秋》2008-11-03；
- 3、尚丁：《〈展望〉周刊始末》《新闻与传播研究》1982年06期；
- 4、贾植芳：《一段难以忘却的记忆》，《上海文学》1991年(4)期；
- 5、杜导正：《牢记“反右”斗争那段历史》，《炎黄春秋》2003年第3期；
- 6、王典昌：《陈崇桂》，（本文作者根据《四十年后——陈崇桂自传》1947年出版的英文本，及胡信生《陈崇桂牧师回忆录》，（《襄樊基督教志》初稿），及湖北省、武汉市三自有关档案材料等资料写成。原载1986年7-8期《湖北省志宗教志简讯》；

四、研究性著作

- 1、陈明远《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文汇社 2006-2-1；
- 2、胡平《禅机：1957年苦难的祭坛》，广东旅游出版社 2004年6月第一版；
- 3、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明报出版有限公司 2004年第一版；
- 4、叶永烈《反右派始末》，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5年12月第一版，1996年2月第一版；
- 5、朱地《1957：大转弯之谜——整风反右实录》，山西人民出版社、书海出版社 1995年4月第一版；
- 6、沈展云 等编、徐铸成等著《中国知识分子悲欢录》，花城出版社 1993年8月第一次版；
- 7、薛建华《毛泽东和他的“右派朋友”》，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年12月第一版；
- 8、《怀念陈崇桂牧师》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编辑，上海出版印刷公司承印 1991年2月第一版；
- 9、丁抒《阳谋》，香港九十年代出版社 1991年第一版；
- 10、邢福增《中国基要主义者的实践与困境：陈崇桂的神学思想与时代》，建道神学院出版社 1990年出版；
- 11、《中国的反右运动》（根据印度加尔各答巴格齐出版公司 1979年第1版译出；
- 12、美国学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百花齐放运动与中国的知识分子》The Hundred Flowers Campaign and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1960年；
- 14、查尔默斯·约翰逊：《中国共产党对知识阶级的政策》(Communist policies toward the intellectual class) 1959；
- 15、陈权：《“鸣放”选萃》（第一、二册）1958著；
- 16、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右派斗争中吸取教训——记党的捍卫者和青年的败类》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1957年10月；
- 17、袁行霈等：《向右派开火》，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7年9月第一版；

五、研究论文

- 1、徐有威：《唾面自干：陈仁炳的晚年》，《百年潮》2003年第8期；
- 2、王海波：《中国最后一个右派陈仁炳》，《世纪》1995年，(9/10)期；
- 3、严如平：《胡耀邦为“右派”平反》，《江淮文史》2011年第5期；
- 4、郭德宏：《评中共历史上的“反党集团”》，甘肃理论学刊 2010年第2期；
- 5、胡晓：《暖春是怎样变成严冬的：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到反右派运动》，《安徽史学》2009年第1期；

-
- 6、姚润田：《反右派斗争与反右派运动扩大化原因探讨》，《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 年第 3 期；
 - 7、马勇：《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试论〈时务报〉内讧》，《安徽史学》2006 年第 1 期；
 - 8、王春霞、傅新球：《试谈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角色认同”》，《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20 卷第 1 期；
 - 9、陈奉孝：《五七年右派思想认识的局限性》，《历史解读》2010 年 4 月 30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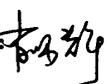
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论文中除了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不包含其他人或机构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其他同志对本研究的启发和所做的贡献均已在论文中做了明确的声明并表示了谢意。

作者签名：日期：2013.6.2.

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上海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它手段保存论文。保密的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规定。

作者签名：导师签名：日期：2013.6.2

本论文经答辩委员会全体委员审查，确认符合上海
师范大学硕（博）士学位论文质量要求。

答辩委员会签名：

主席（工作单位、职称）：

吴量平 复训学院教授

委员：

吴晓英 教授

贺朝霞 教授

李冠华 教授

导师：

洪小夏 教授